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红色资源概览

INTRODUCTION TO RED RESOURCES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目录

第一篇 资源简介

• 第一章 基本概况	1-2
• 第二章 历史文化渊源	3-14
• 第三章 独特优势	15-18

第二篇 主题内容

• 第一章 复原陈列	19-25
• 第二章 主题陈列	25-38
• 第三章 辅助陈列	39-42

第三篇 展陈故事

• 第一章 文明其精神	43-47
• 第二章 积久成学恒有贵	47-52
• 第三章 野蛮其体魄	53-59
• 第四章 读无字之书	59-66
• 第五章 良师熏陶，学友砥砺	66-87
• 第六章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87-95
• 第七章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96-101

第四篇 特色活动

• 第一章 志愿服务	102-105
• 第二章 红色讲坛	105-107
• 第三章 主题活动	108-109
• 第四章 特色体验	109-110
• 第五章 红色影视	110-111



第一篇 资源简介

在湖南省长沙市美丽的湘江之滨，城南妙高峰下，有一座中西结合、庄重典雅的建筑群落，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但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在高楼林立的现代都市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别具一格。这就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闻名遐迩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

这所培养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著名学校，这个留下了一代代湖湘巨子串串足迹的古老学府，既有千年学府的滚滚思潮，又有百年垂范的谆谆师训，更有那穿越时空的醒世曙光，荡漾于湖湘文化的沃土之上。



第一章 基本概况

湖南第一师范前身为公元1161年创办的南宋城南书院，1903年始立师范馆，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的美誉。湖南第一师范作为全国最早的五所师范学校之一，在民国时期的湖南享有“亚高学府”之誉，是湖南近代师范教育的起点，也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典范。

这里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的母校，毛泽东在此学习、工作长达八个春秋。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从事了建党、建团等早期革命活动，完成了由一个学生、教员向职业革命家的转变，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并从此启程，奔赴中共一大，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第一师范也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

这里是湖湘人才的宝库，从这里走出的一代代湖湘巨子，改写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据不完全统计，师生载入辞海者达55人（含城南书院时期）。

这里人文博厚，文献丰富，建筑独特，环境清幽，纪念意义十分重大。依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建立的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宣传青年毛泽东光辉业绩的专题性高校博物馆，为隶属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二级机构，与学校文物管理处合署办公，负责开展文物保护与管理、校史整理与研

究、爱国主义教育与人文学科普及、旅游开发与游客服务等工作。

为了学习、宣传青年毛泽东思想及其光辉业绩，早在1963年，中共湖南省委、中共长沙市委就下拨专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兴建了“毛主席陈列室”，开始对社会开放。1969年初，更名为“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由郭沫若题写馆名。1993年底，第一师范在校内妙高峰上新建了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铜像由江泽民题名、李铁映书碑）和汉白玉浮雕花园。2003年底，陈列馆扩建并更名为“青年毛泽东纪念馆”。2013年，青年毛泽东纪念馆进行了扩馆改陈，并更名为“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提质改造后的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以“一代伟人从这里起步”为主题，设有反映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执教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史实的基本陈列展厅六个、辅助陈列展厅四个。陈展内容丰富多样，形式美观生动，并采用了多样化的现代媒体展示方式。

湖南第一师范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解放事业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徐特立、谢觉哉、邓颖超、李锡铭、耿彪、宋任穷、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栗战书、赵乐际、李长春、李铁映、王兆国、刘延东、彭珉云、陈至立、周铁农、路甬祥、徐匡迪、刘晓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莅校视察，十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曾来校访问，主席亲人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孔东梅等也曾到此缅怀。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是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最佳课堂，影响遍布宇内。自1963年正式开放迄今，已为社会公众服务50多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000万人次以上。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有100多所大中小学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作为德育教育基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建党伟业》《湘江北去》《毛泽东》等众多红色影视巨作于此取景拍摄，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作为“百姓喜爱的湖南百景”“长沙市十佳旅游景区”“长沙市十大地标名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精神以及关于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更更新的态度为新时期专题性高校博物馆建设、社会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更多的努力。

第二章 历史文化渊源

第一节 千年学府 丽泽风长

一、城南胜景出书院

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城南书院始建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是南宋文化标杆式人物、理学大师张栻与其父张浚在长沙的居所。张浚为南宋中兴名臣，官至宰相。他力主抗金，率领岳飞、韩世忠等为南宋抗金建有军功。

张浚虽是四川人，却与湖南接下了不结之缘，他一生三次被贬到湖南永州。1138张浚年被贬湖南永州。其子张栻，这年八岁便随父亲颠沛流离到湖南南部。不得志的张浚穷尽平生所学，对儿子教以仁、义、礼、信等，寄予厚望。张栻幼承庭训，好学深思，颖悟夙成，可谓少年早慧。

张浚在湖南境内为张栻遍访名师，终于获知南岳衡山藏有号称五峰先生的大学问家胡宏，他是经学家胡安国的儿子，是哲学家、教育家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

张浚大喜过望，即刻命张栻上南岳衡山去拜胡宏为师。张栻非常勤奋好学，加上家学基础，学业精进有成，张栻成为“卒开湖湘之学统”胡宏的得意弟子。

绍兴三十一年正月，金军南犯已迫在眉睫，宋高宗在不得不作抵抗准备的同时，也放宽了对张浚居住地点的限制。同年十月，在宋金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又起用张浚任判潭州，也就是同意他离开永州到长沙居住。

到长沙后，张浚便在长沙城南风景秀丽的妙高峰构筑庐舍，另辟桃园藏修授徒，这便是城南书院的肇始。

其时，从南岳学成下山的张栻也随父来到长沙。

初建的城南书院，兼具私家园林性质，张浚、张栻父子在书院内精心营造了“城南十景”，供潜修学问之余流连题咏、寄情山水、陶冶性情。整个书院旧迹宽阔，有“屋宇三十一所，基地园土二十六处”，占地约十数亩之多。

张浚对这处居处兼讲学之所也非常喜爱，穷尽笔力书“城南书院”的匾额，四字成为他平生得意之笔。大门夹立两坊，左边题写“岳峻”，右边题写“湘清”，如诗描写“麓山屏其前，湘水带其下。”

书院门前有禁蛙池，相传张栻夜读，池中蛙声聒耳，便把砚台投池中，蛙声顿时停止，因此取名禁蛙池。

宋代的城南书院风景极为优美，中建丽泽堂、书楼、蒙轩、月榭、卷云亭。后为妙高峰、高阜绵延五六里，中间有来之天鹅湖、老龙潭、白沙井的山涧溪流，绕峰而至书院左前方的大椿桥，奔泻入“湘水带其下”的湘江。前面湘江如

玉带北去，岳麓、圭峰、橘州，一览俱下，而树木葱茏、花香鸟语，白鹤翩翩。书院右修竹成林，名琮谷；锡潭水涓涓流到纳湖，湖中有采菱舟、听雨舫。

当时书院以“十景”扬名，即书楼、蒙轩、月榭、丽泽堂、卷云亭、南阜、纳湖、琮谷、听雨舫、采菱舟。“十景”外，附近还有东渚、咏归桥、船斋、兰涧、山斋、石濑、柳堤、濯清亭、西屿、梅堤等十大胜迹。

张栻留下的《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以及他与朱熹相互唱和的四十首诗，可见城南书院当时环境之美和足见他对城南书院的喜爱。

二、朱张会讲照汗青

从1161到1169年，张栻担任城南书院山长和主讲，讲学的主要内容为“义理之学”。他讲学以“义理”为先，重视践履之行，忌夸夸其谈。城南书院采用先个人研读，然后相互提问质疑，最后集众由主讲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学习内容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定期不定期开展时政议论。

张栻的办学宗旨在于传道济民，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张栻主持城南和主讲岳麓两书院，对湖南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学术思想和教学方法吸引了广大青年才俊慕名前来求学。

湖湘学派的声誉鹊起，引起了远在福建理学南渐的另一代表人物朱熹的关注，他不远千里前来理论。1167年8月，朱熹在弟子范伯崇、林择之的陪同下，由福建崇安赶往湖南，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9月初抵达长沙，会访张栻，受到张的热忱款待。这种为学精神，实在是为读书人万世师表。

朱熹在长沙逗留两个多月，与张栻就理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中和、太极、知行、仁说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场面之热烈、辞锋之锐利、态度之恳诚、听者之广泛，前所未有。

据清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载，范伯崇说：“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甚至同床共寝，“妙语夜连床”。

两人的辩论，主要是结合讲学进行。他们在会讲之日，大设讲坛，听讲者蜂拥而来，据称：“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

通过讲学辩论，他们不仅切磋学问，求同存异，去短集长，促进交流，彼此敬重，增进友谊，而且为后世树立了很好的学术争鸣的榜样。

朱熹对这次会讲印象极深，受益颇多。他常对学生感慨说道：去年去湖南，通过与张栻讲学辩论受益不少。他在唱和张栻的丽泽堂诗中写道：感君怀我意，

千里梦相寻。张栻用学问折服了朱熹，两人相见恨晚。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学术交流的崭新形式。因张栻和朱熹曾在城南书院讲学论道，故而声名远扬，使得天下学子以不能卒业于此引以为憾。

朱张会讲开创了南宋不同学派及其书院会讲的先河。张栻和朱熹在相互的学术交往中，开创了自由讲学和互相辩难的新学风，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刺激、互相启发，两人在扬弃、批评和吸取对方观点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各自的学术思想。

此后，相继有“鹅湖会讲”、“白鹿洞会讲”、“武夷会讲”等。“会讲”不仅是书院开展教育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是南宋时期各派思想家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

可惜，天妒英才，张栻47岁英年早逝。学者全祖望痛惜地感叹道：“向使南轩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是啊，要是他生年更长，他留给后世的学问与英名，将更为显赫。

南宋城南书院兴盛时期，湖湘弟子受张栻的影响，重视“经济之学”作为“践履”的重要标准。张栻直接培养的一批弟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

《宋元学案》中记载南轩门人及再传弟子，成器者达数十人。其中有“开禧北伐”功臣吴玠、赵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鯁之臣”彭龟年，组织抗金、“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善于理财，整顿“交子”（纸币）卓有成效的陈琦，“光于世学”的理学家张忠恕等。他们真正践履了张栻的“传道济民”的理想，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更加流光溢彩。

张栻在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八年教育实践，创造了自己的书院教育思想体系，张栻的书院教育思想、讲学治学方法成为了城南书院的优良教育传统，被传承、发扬，其精髓“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成为城南书院的教育圭臬，影响了湖湘千年不绝的弦歌教化，为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湖南一师师范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三、城南书院合并天心阁

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离开长沙后，城南书院及“十景”逐渐荒废。南宋灭亡后，书院历经波折。元代时废为僧寺。明正德二年（1507）、嘉靖四十二年（1563）两度修复，万历六年（1578）再度废弃。

雍正1733年，中国书院史上有一重要事件，即省会书院的设立。当时全国建

立的省会书院有23所，其中湖南、江苏、广东、广西各为2所，其他省份各为1所。湖南的两所省会书院即岳麓书院与城南书院。可见在雍正年间城南书院是有办学的，而且还是全国23所省会书院之一，其地位就如今天的985高校。其后又毁于何时何因，尚不得而知。

清乾隆十年（1740），杨锡绂任湖南巡抚，他便赴岳麓书院课试生童，等了半天，要他非常失望，煌煌书院，前来应试的生童寥寥无几。详问其故，只因长沙城到岳麓书院交通不便，常有危险，“中隔湘江，稍遇风涛，士子即畏涉不前”。育才心切的杨锡绂决意将岳麓书院肄业诸生迁移至湘江东岸的城内就读。恰巧长沙都正街都司衙门有一处闲置楼宇，于是将其改建成书院。因书院在城南一角，且距离妙高峰原城南书院旧址仅二华里许，于是就称其为“城南书院”。并仿制岳麓书院御书“道南正脉”匾悬之讲堂。

从此，天心阁下一片弦诵之声。欣慰之余，杨锡绂曾作《迁建城南书院记》详述了迁建的理由。开篇便指出：“宇宙之事功视乎人材，人材之造就在乎学校。书院者，拔学校之尤而切劘淬厉，以收造士之实效，辅学校之不逮也。”接着指出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原相表里，以朱张两大儒往来讲学之地，存其一而湮其一，对湖湘省会都是一大缺陷事，并希望“冀后之人两存而并护之也”，两大书院共存共发展。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城南书院的规制已十分完备，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已经与岳麓书院并驾齐驱，取得了“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材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的效果。只是招生名额只有108人，比岳麓书院少30人，而且只在长沙一郡招生。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城南书院在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时期再次得到了重修，天心阁被并入书院。其后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曾先后三次对城南书院进行大修。天心阁“雄控湘城”，地位之要不言而喻，能够并入城南书院，反映出城南书院从乾隆十年到四十二年短短几十年间的飞跃式发展。

四、故址重建 丽泽风长

嘉庆二十五年（1820），随着城南书院的发展和人才辈出，前来求学的人数俱增，而招生名额又不够，岳麓书院由于交通问题，前去求学的人不是很积极，于是城南书院便占用岳麓书院的名额招生。可见此时，城南书院在当时读书人中的影响已超出岳麓书院。

湖南巡抚左辅认为城内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治，逼近闹市尘嚣，且地洼低

湿，空间狭小，不利于学子静修。于是他联合布政使程祖洛捐资，在城南妙高峰旧址重建城南书院，至清道光二年（1822）完工。

至此，城南书院从清乾隆十年（1745）起至清道光二年（1822）始，在天心阁下存在达77年后，又回迁到其660余年前的始创地——妙高峰。

在妙高峰旧址按照城南书院原貌进行大规模复建，堂构整齐，斋房栉比，规模却比南宋时大了十倍，又增购图书至10555卷。为纪念张栻，还在妙高峰上增建了南轩夫子祠，前面高峰寺所在地建文星阁。

道光二年冬，堂斋主体建筑建成，便向道光皇帝具奏，请求御书匾额，道光皇帝欣然赐“丽泽风长”以嘉城南书院的办学业绩。

道光二年（1822年），城南书院复建竣工，巡抚左辅将城南书院迁至妙高峰旧址，在招生方面，朝廷终于给城南书院以岳麓书院同等的待遇，增加了招生名额到138名，与岳麓书院一致，而不再是占用岳麓书院的名额。其招生范围不再局限于长沙府一地，而是扩展到整个湖南，成为与岳麓书院一样的通省士子肄业之所，开始了通省书院的历程。

寂然500多年的城南书院再度兴盛，又成为湖南的最大书院之一，再度步入了她的辉煌时代。书院内曾有清光绪进士梁鼎芬所撰一联：往事忆觚棱，身别都门二十载；新旧尽桃李，教成君子六千人。此联道出城南书院桃李满天下之盛况。

从此，作为与岳麓书院双峰并峙的湖南两所通省书院之一，城南书院步入辉煌时代，成为湖南贤士才俊传道受业、脱颖而出的大本营。三湘名士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等曾在此担任山长兼主讲；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以及中华民国元勋黄兴等曾求学于此。

五、昔贤过化之地

城南书院被誉为湖湘文脉渊源、文化渊薮，湖南昔贤过化之地。劳崇光在《城南书院赋》中有这样的描绘：“物态凝眸而盎盎，千古灵区；弦歌入听仅雍雍，一方雅化。”盛赞城南书院为求学藏修胜地。

湖南一师前身城南书院早在创办之时即有南宋理学宗师“东南三贤”之张栻、朱熹于此讲学。迨及晚清，人材辈出。湖湘大儒余廷灿、贺熙龄、余正煊、胡达源、陈本钦、孙鼎臣、何绍基（晚清著名书法家）、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王先谦（晚清湖南“二王”之一）等先后主讲城南。城南书院讲学大多汉宋并重，尤重经济之学，造就人才甚众，最著者有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

臣）、左宗棠（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晚清中兴名臣）、罗泽南（湘军之父）、贺长龄（晚清经世派代表）、李元度（晚清史学大家）、王闿运（晚清湖南“二王”之一）、邓辅纶（晚清著名学者）、樊锥（晚清维新派代表）、张百熙（晚期著名教育家，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皮锡瑞（晚清经学大师）、黄兴（民国元勋）、刘人熙（民国著名政治家）、程潜（民国著名政治家）、杨昌济（民国著名思想家）、李肖聃（民国文史大家）、杨端六（民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宗石（民国著名法学家，湖南大学校长）、文斐（民国著名学者）等。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千年学府、丽泽风长，至此蝶变，进入现代师范教育新的历史阶段，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一所学校里直接正面碰撞、激荡。

第二节 百年师范 伟人摇篮

一、百年沧桑 薪火相传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2月，湖南师范馆在长沙城内黄泥坝（今芙蓉区浏城桥附近）成立。湖南师范馆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五所师范馆之一，馆长为湘中大儒王先谦。湖南师范馆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师范教育的发端，标志着湖南第一师范的诞生。1903年11月，赵尔巽废城南书院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其后湖南分路办学之议起，即设三路师范，长沙为中路（长沙、宝庆、岳州三府），常德为西路（常德、辰州、沅州、永顺四府，澧、靖二州，南州、永绥、凤凰、乾州、晃州五厅）、衡阳为南路（衡州、永州二府，郴、桂阳二州）。因此，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改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停办数月。民国元年（1912），改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师范”之名正式诞生。是年，一师借鉴日本东京府青山师范学校（今东京学艺大学）建筑样式，结合中西建筑风格，重新修建校舍。1914年初，学校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入，并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后，湖南一师迅速发展成为声誉卓著的中国名校之一，南洋和朝鲜亦有学生慕名前来求学。1926年下期，湖南中等教育由仿效日本式的普通中学系统与师范学校系统分立的双轨制，改为美国式的单轨制——综合中学，第一师范被改为湖南省立高级中学教育科。1927年“马日事变”后，学校被迫停办，学生自行散去，次年春复课。1929年1月，师范科分

出，第一师范得以恢复。但湖南反动当局提出一师一贯出“暴徒”和“过激派”，党派活动过多，为“端正趋向”、“挽回风气”，在一师校园内续办了省立第一中学（直至1938年该校毁于“文夕大火”），而将恢复后的一师迁至省党部附近的教育会坪原国民党省党校内开办，并改称“新一师”。1930年，红军攻打长沙时，学校也曾停办。抗日战争期间，一师辗转于湘乡西阳、安化桥头河等地办学。1939年2月，一师与省立一中、二女中等七校又合并为湖南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分设师范部。1941年1月，师范部从“临中”分出，一师得以再复原名。1946年初，一师由安化桥头河搬至长沙市岳麓山左家垅，直至1954年。

1949年8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更名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并陆续将长沙师范学校男生、湖南建设中学师范部、湖南省艺术师范学校等并入。1950年底，受周世钊校长所请，毛泽东同志特为母校题写“第一师范”校名，并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1954年，根据教育部和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决定，学校从左家垅搬回妙高峰书院坪原址。1967年，李富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湖南第一师范按1912年校舍原貌在原址开始复建。1969年初，学校修复工程全部完成（包括新建的火炬楼），建筑面积21,241平方米，其中，陈列馆建筑面积6,803平方米。1978年，湖南一师被教育部选为全国重点学校之一。2000年，学校升格为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008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为现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二、主席母校 群星灿烂

享有“千年学府，百年师范”美誉的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悠久，人文博厚，具有“名校名师育名人，名人名师壮名校”的特色。自近代以来，湖南一师大师荟萃，英杰辈出，培养了大量的国家级世界级名人，引领着中国社会的改良、革命与现代化，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近现代湖湘文化重镇与湖湘人才摇篮。

1903年创办师范教育以来，湖南一师更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陈天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李维汉、萧三、张昆弟、任弼时、夏曦、段德昌、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瓚、郭亮、李泽厚等曾在此学习；徐特立、杨昌济、黎锦熙、王季范、孔昭绶、易培基、易白沙、匡互生、杨树达、李达、周鲠生、谢觉哉、田汉、周谷城、夏丏尊、汪馥泉等曾在此任教。学校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人

才，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3位（毛泽东、何叔衡、李达）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友；中共在西北坡的五大书记中有2位（毛泽东、任弼时）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前四任书记（毛泽东、李维汉、夏曦、郭亮）都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据不完全统计，载入《辞海》的一师师生（含城南书院时期）达50余人。一师师生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8人，无产阶级革命家9人，无产阶级军事家2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人，革命军总司令、大元帅1人，国民政府首脑1人，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2人，还有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3人。

自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第一师范本科一部第八班就读。他胸怀救国大志，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力行德智体“三育并重”，刻苦攻读、潜心研究，顽强地进行体格锻炼。同时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创办工人夜学，深入农村调查，团结志同道合者，建立新民学会投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在20世纪早期青年中出类拔萃。自1920年秋至1922年冬，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任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兼任师范部国文教员。他致力于革新教育，开办成年失学补习班和民众夜学，并创办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从事建党、建团工作，由第一师范出发奔赴党的“一大”会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在第一师范附小结成革命伴侣。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完成了从青年学生、教员到职业革命家及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解放后，毛泽东即电慰母校师生“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务”。1950年12月，亲笔书写“第一师范”校名和“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校训。同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回忆一师时代云：“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三、师范摇篮 教育典范

湖南一师作为中国师范教育的摇篮之一，施行兼容并包与民主自由的教育理念、崇文尚武与自动自治的教育模式、古今结合与中西贯通的教育内容、学以致用与培养能力的教育实践，完整折射了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模范。

早在1903年设立湖南师范馆始，一师就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并自觉担负起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使命。自1909年至现在，一师始终“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探寻师范教育、小学教育的规律，建立了完整而先进的教学理论及教学方

法，培育了当时社会急需的人才，是我国早期师范教育的殿堂。

湖南一师自创办之日起，即全心全意依靠知识分子办学，汇集了大批思想先进、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们以进步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致力于“作育人才，振发民智”，改革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使早期湖南一师的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为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王先谦担任湖南师范馆馆长时，虽坚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然主张学习务实之学、“多读有用之书”，在一定程度上倡导“新学”，为湖南一师民主教育的确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王先谦还主张发展实业教育，认为实业教育有“开利源、塞漏卮、养穷民、收游民、开民智、纾国困、培邦本、足国用、保国威、保名教”等功用。

孔昭绶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时，忠实贯彻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与措施，对学校教育实行全面改革，确定了最新民本主义教育方针。湖南一师“最新民本主义教育方针”以“知耻”为中心，辅以“公诚”、“勤俭”的基本操行准则，从“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三个方面对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及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既强调“健全之精神”、“高尚之志趣”的培养，又注重“健全之身体”、“自动之能力”的养成；既注重职业技能的训练，又注重“锐意研究”能力的培养；既关注读有字之书，又崇尚读“无字之书”；提倡“自动”、“自治”，主张面向小学。

易培基担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使湖南一师成为了“湖南教育界的一面旗帜”。易培基为湖南一师建立了新的教员队伍：他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和省内外先后聘请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和改革精神的教员，如周谷城、李达、舒新城、夏丏尊、沈仲九、辛树帜、徐钰礼等，还聘请匡互生、熊瑾玎、毛泽东分别担任教务主任、庶务主任、附小主事。他改革了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方面，要求清除颂扬封建主义的旧教材，采用传播新文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教材；教学方法方面，极力废除注入式，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他提倡民主管理与学术自由：为推行民主管理，他废除学监管理制度，由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选举会长和干事，其代表参加学校校务会议，允许提出意见，参加讨论；学术方面，在教员的指导下，学生纷纷组织各种社团，就政治和学术问题在自办刊物、版报上，各抒己见和相互辩论。他还改革招生制度：在招生方面，他打破过去按县分配名额由县组织考试，再由学校复试的制度，改由学校直接考试录取，广招省内外乃至国外求学者；1921年，湖南一师在湖南率先实

行男女同校，开始招收女生，并取得成功。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一师即已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提出“以世界观和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本”。因而，经由一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都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思想境界。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师还坚持把体育教学、课外锻炼、运动竞赛三者结合起来，不仅增强了学生体质，为小学教育培养了体育师资，也造就了一大批的体育人才。

在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方面，一师把“提倡自动主义”、“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作为贯彻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一项基本要求，采取各种举措，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时期，一师以提倡新民主为契机，各种社团林立，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学社蜂起。

在教育学科教学和研究方面，一师早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开设了心理学、教育学、各种教授法，配备了教育实习主任，实行了小学教授、管理实习制度等。“五四”以后，又先后在师生中成立了“小学教育研究会”、“儿童文学研究会”、“儿童教育研究会”。解放后，更是不断加强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专设了教育科学研究室，以探寻师范和小学教育规律。

在附小建设方面，一师自1913年开始长期保持着两所附属小学。1978年，一师一附小列入全国重点小学，二附小也办成了省内外的名校，为师范部的教学、科研，为师范生的教育实习、见习、观摩提供了理想场所。因此，走进一师，就如同打开了一本师范教育的百科全书。

四、革命源泉 人文圣地

湖南第一师范作为湖南近现代进步师生的大本营，是名副其实的湖南新文化运动发祥地和湖南近现代革命运动策源地。湖南一师进步师生用他们的信念与生命，抒写了中国革命史、文化史，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与教育价值。

民国初年的湖南第一师范集聚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孔昭绶、易培基、方维夏、易白沙等一批具有民主教育与现代启蒙思想的教师，他们的进步观念通过课堂内外传播给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三、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他们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英勇斗争，推动湖南新文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并为团结社会各界，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大致以1914年宏文图书社及其附属的《公言》杂志

的创办和1915年9月创刊的长沙《大公报》为主要标志，在时间上比上海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还要早。

1914年初，湖南一师教员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人在一师教师公寓芋园创办了宏文图书社。宏文图书社及其编译所，以翻译东西论著、刷新社会、挽救民族危亡为目标。

1915年9月1日，一师副校长兼教务长、时任长沙《大公报》副社长的贝允昕和龙兼公、刘人熙等主办的《大公报》在长沙创刊出版。首期“时评”栏目发表的“本报对国体问题之主张”称：“倾覆共和国体”，“真谓狗彘不食也，本报誓当秉春秋之笔以诛之”。该报对袁世凯的罪行给予揭露抨击，深受省内外人士欢迎。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易名《新青年》），此为全国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青年》以其清新的文风和民主、科学的精神，受到了一师广大师生的欢迎。

一师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在自己阅读《新青年》的同时，还向友人和学生推荐，且出资购买分赠给毛泽东、蔡和森等得意门生。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不重视体育的忧虑，呼吁人们要重视体育，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以杨昌济、黎锦熙指导的哲学研究小组为中心，湖南一师形成了一个进步的学生群体。这个群体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并走向社会，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在由一师人主持的宏文图书社、长沙《大公报》以及上海《新青年》的影响下，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出现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高潮。

1918年4月14日，湖南一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等青年学生在长沙饮马塘刘家台子蔡和森家组织成立“新民学会”。该会之后成为湖南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具有“建党先声”的历史性意义。在新民学会的全部会员中，一半以上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思想家和领袖人物。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7月14日，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在湖南所有刊物中，《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最为彻底。在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的刊物多达十余种。由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何叔衡邀请谢觉哉主编的《湖南通俗报》，聘请熊瑾玎、周世钊任编辑，也是湖南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该报刊登了许多记述本省各地劳动、教育、实业状

况的调查资料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通信，还介绍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后期，湖南涌现了一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毛泽东发起创办的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1920年7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发起成立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的成立对新书报的宣传介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湖南的迅速推销，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8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该会以研究俄罗斯的一切事情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会务内容。该会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等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来赴俄国留学。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对于湖南社会各界了解苏俄情形起到了重要作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是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新民学会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学会先派蔡和森赴北京接洽联系，后由毛泽东等到北京协助开展留法运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部分成员积极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前夕和初期，湖南一师学子毛泽东、何叔衡等已在湖南进行了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和1921年以后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广泛的革命活动，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湖南一师的师生战斗在斗争的前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湖南一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校友惨遭杀害的就有100人左右。1931年“九一八”炮火掀起了湖南一师师生抗日救国的浪潮。抗日战争时期，湖南一师校友奔赴延安抗日救国者达30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一师师生又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内战的活动中。

湖南第一师范培养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团体，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策源地之一，对于湖南历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李维汉说：“湖南第一师范校史是一部教育史，也是一部革命史。”湖南一师不愧为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湖南近现代革命运动策源地。

第三章 独特优势

第一节 独特的校园建筑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作为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是我国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建筑珍品，是湖南乃至中国、东亚高校建筑的典型。

清宣统二年（1910），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主体建筑被焚毁。民国元年（1912）夏，新舍方落成。新落成的一师校舍是民国时期湖南的代表性建筑。193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舍再毁于长沙“文夕大火”。现有之建筑为1967年湖南省政府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于1968年前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原址基础上严格按照1912年原貌复建的。复建后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建筑群以其对历史风貌的尊重性还原及其独具匠心的建筑与园林艺术，形成了高度浓缩的人文磁场，成为了人们追忆城南旧事、凭念先贤先驱的重要纪念场所。

一师旧址建筑群建筑是中国高校建筑的孤例。它借鉴了日本东京府青山师范学校（即东京第一师范学校，今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建筑样式，风格以西式为主，整体采用古罗马券拱技术与圆柱风格；同时结合江南气候特点，采用二层群体砖木结构和中国传统庭院式布局，是不可多得的集东方文化内涵与西方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杰作。

一师旧址建筑群建筑大小不一，平房楼房相间，高低错落有序。建筑群大部为中庭格局，平面布局或呈“凹”字型（办公楼），或呈“凸”字型（自习楼），或呈“H”字型（教学楼），或呈“回”字（寝室楼）。建筑外观庄重典雅，科学地考虑到了采光、通风和排水的效果。在各楼栋之间，13条风雨连廊迂回贯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现占地66,670平方米，建筑面积53,500平方米，其中文物建筑包括传达室、办公楼、大礼堂、教室、水井、君子亭、火炬楼等36栋，占地26,343平方米。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建筑群主要包括主体连廊建筑、一师附小和工人夜学旧址三大部分。旧址主体建筑位于校园中部，由毛泽东青年求学时期的办公楼、教学楼、自习楼、阅览楼、大礼堂、寝室楼等组成。旧址办公楼为主入口，楼顶墙面上有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的校名“第一师范”，遒劲大字，熠熠生辉。南北两条东西走向的大道将整个学校旧址一分为三。主体建筑左侧为一师附小，右侧为工人夜学旧址，两侧建筑风格与主体连廊建筑协调一致。

另外，一师旧址建筑群中还有风格独特的苏式建筑“火炬楼”。“火炬楼”位于妙高峰顶，为原城南书院南轩夫子祠、船山王先生祠所在地。“火炬楼”平面呈长方形，四周环列36根高大的方形廊柱，内设天井；外表为浅黄色瓷砖，上有橙色的琉璃瓦屋檐。正面门额上镶嵌着青年毛泽东的宏伟抱负、新民学会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屋顶四角建有巨大的火炬灯。建筑庄严雄伟，壮丽典雅。作为妙高峰与长沙标志的“火炬楼”今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校区图书馆。驻足楼顶，湘江岳麓，长沙老城，一览无余。

一师旧址建筑群朴素中蕴含着华美，简单中蕴含着精巧，宁静中蕴含着生机。整体建筑巧妙地体现了古典书院与现代大学的文化承续，近现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传统革命与现代文艺的时代氛围。

在当年朱张会讲、毛蔡论学的一师庭院里，有教授学者潜研学术，有六年制定向师范本科生作画弄琴，有附属小学学生的朗朗书声，有讲解员“一代伟人从这里起步”的明快解说，有众多游人来来往往拍照留连。神圣与平凡，古典与现代，革命与和平，老年与青春在这里构成了一幅独具魅力的画面。

第二节 雄厚的教学与科研力量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是隶属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二级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有从事爱国主义教育相关专业研究的博士、教授三十多人，有湖南省青年毛泽东研究基地（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城南书院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等多个科研、教学机构，致力于开展毛泽东生平与思想、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等人文社科研究。依托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强大的师资源，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形成了一支由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化、梯队化科研队伍。

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和湖南省青年毛泽东研究基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教职工主持和参与有“青年毛泽东的价值观”等国家级、省部级社科课题十余项，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共四卷）《毛泽东教育思想探源》《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与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教育家的摇篮——湖南第一师范》《湖南一师颂》《湖南早期师范教育与人才培养——湖南第一师范个案研究》《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等数十部著作，荣获各类各级科研奖励十余项。

第三节 优质的服务与便利的交通

一、有较成熟旅游、研学线路成熟

（一）长沙历史步道

长沙历史步道集文化展示、教育学习和学术交流于一体，链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西文庙坪两个历史地段和太平街、潮宗街两个历史街区，向北到达开福寺。根据长沙历史步道各段的历史文化资源特色，开辟有由北往南的千年古刹、教堂公馆、湖湘民俗和书院文庙四个特色主题游。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位于长沙历史步道，是研学旅行线路上的重要景点。

（二）青年毛泽东求学成才之旅

追寻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在湖南的求学成才足迹，学习青年毛泽东远大志向和奋斗精神，励志成才报国：韶山（毛泽东故居、南岸私塾）→湘乡（东山学校）→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旧址（今长沙一中老校区）→省立图书馆旧址（今定王台长沙市图书馆老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岳麓山→橘子洲头。

（三）青年毛泽东游学实践之旅

1917年夏，青年毛泽东与萧子升游学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实地考察了解社会各阶层群众的生活。青年毛泽东游学实践之旅为：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宁乡→安化→益阳→沅江→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该线路可使研学旅游的青少年效仿青年毛泽东，学会调查研究、观察社会、了解现实，采用进企业、下社区、到农村，或开展红色夏令营等形式展开。

（四）青年毛泽东早期革命之旅

顺着当年毛泽东在长沙建党建团等早期革命活动足迹开展追寻、学习之旅：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潮宗街文化书社故址→湖南自修大学旧址（船山学社旧址）→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今清水塘长沙市博物馆旧馆）→爱晚亭→岳麓书院→橘子洲头（《沁园春·长沙》）。

二、拥有专业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讲解队伍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拥有一支高水平讲解接待队伍。同时，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充分发挥馆校合一的优势，通过精挑细选、严格培训和建章立制、规范管理，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学生志愿讲解队伍。学生志愿者的青春活力、奉献精神，大方得体的讲解和服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近年来，长沙晚报、湖南教育电视台等媒体还专门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这些专业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讲解队伍，能够为研学活动的开展提供讲解服务保障。

三、交通便利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地处长沙市中心城区，最繁华的黄兴路步行街只有55米左右，交通非常便利。10多路公交车经停第一师范公交站，其中一些分别直达火车站、火车南站（高铁站）、汽车南站、汽车东站。附近500米内还有地铁3号线和1号线站点。

第二篇 主题内容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俯瞰

第一章 复原陈列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现属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现保存与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执教和从事早期革命活动有关的复原陈列纪念点有十四处，包括第八班教室、第八班寝室、第八班自习室、阅报室、大礼堂、水井、君子亭、第二十二班教室、附小主事室以及工人夜学旧址等。

第一节 千年学府 丽泽风长

湖南第一师范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华名校，是一代伟人毛泽东青年时期学习时间最长的地方，他在这里学习五年半、工作两年半，他对学校充满了感情。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亲笔为母校题写了“第一师范”的校名，并为母校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以作校训。同年，他的恩师徐特立先生也为学校题写“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以正校风。至今，这都是第一师范师生共勉的座右铭。旧址前楼大厅是游客进入基地参观的第一站。为了牢记主席的教诲，在大厅两面的墙上，分别陈列了校训和校风。

第二节 附属小学主事室

在前楼南侧，有一个墙体灰黄相间的庭院，这就是创建于1903年的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1920年秋，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两年后，毛泽东受易培基校长之聘在附小担任主事（校长）两年半，并在师范部兼任国文教员一年。

附小主事室毛泽东的办公室兼卧室，不足10平方米，而且非常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套桌椅和一个洗脸木架。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这里在举办了简朴的婚礼，结成了革命伴侣。1921年6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从附小出发，奔赴中共

一大会场，成为党的创始人。1922年冬，毛泽东辞去一师及其附小教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第三节 大礼堂

在第一师范求学与执教期间，毛泽东经常组织进步学生和民众在大礼堂讲演文学、讨论时事、锻炼身体。现在，这里仍然是第一师范师生举行各类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大礼堂后墙有一幅油画，描绘的是1922年5月5日，长沙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这里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会上，作为主持人的毛泽东做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痛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当时长沙的《大公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这次大会，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这个大礼堂也见证了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军事行动——猴子石缴枪。1917年，毛泽东率领第一师范约200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警察局约20名警察，智缴了3000余名北洋溃军的枪械，缴获的枪支就曾堆放于此。

此外，大礼堂还发生过许多有意义的事情。1915年5月7日，湖南第一师范明耻大会在此举行。时任校长孔昭绶发表演讲，揭露日本的狼子野心，痛斥袁世凯的卖国、独裁行径。1920年，应湖南省教育会之邀，与杜威、罗素一起来长沙讲学的蔡元培、吴稚晖在这里分别发表过《对于学生的希望》《勤工俭学》等学术讲演。1938年，八路军驻湘代表处负责人徐特立在此发表抗日演讲。

2004年以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湘江北去》《建党伟业》《秋收起义》《长沙保卫战》《反腐枪声》《青春激荡的年代》《永远的军魂》等众多红色影视作品和纪录片纷纷在此取景拍摄或举办开机仪式。

第四节 第八班教室

1913年春，毛泽东以作文满分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2月，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第一师范读了半年预科之后，毛泽东被编入二级三班。1916年，全校实行统一编班，毛泽东所在的班被编为第一师范本科第一部第八班。

第八班教室陈列了三十张课桌椅，右起第一排第四桌便是毛泽东当年的座

位。无论是右进右出的整体式课桌椅以及上下推拿式的黑板，都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历史原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年的湖南第一师范无疑是湖南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

讲台左侧墙壁挂有一幅十分珍贵的照片——这是毛泽东于1918年毕业前夕与第八班同学们的毕业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二人就是当年的毛泽东。由于当时男女不同校，而第一师范是一所男校，所以照片上全部都是男生。直到1921年第一师范才率先在湖南招收女生入学。青年毛泽东辗转多处，曲折求学，终于在第一师范获得了他生平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正式的毕业文凭。



在讲台右侧墙壁上，挂着一张《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活动大事记》，简略记载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执教以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主要事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活动大事记

时 间	职 务
1913年春	以题为《普胜法，毛奇谓当归功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的作文获满分成绩被录入湖南四师预科一班
1914年	四师并入一师，毛泽东编入本科第八班
1915年上期	在一师学生掀起反张干的“学潮”中，开始崭露头角
1915年5月9日	在《明耻篇》一书封面上，奋笔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7年4月1日	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论文《体育之研究》
1917年6月	在学校开展“人物互选”活动中得票数居全校第一
1917年7月	与萧子升一道利用暑假，行程近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进行了农村调查
1917年11月9日	主办的工人夜学正式开学，并兼历史课教员

1917年11月18日	成功地组织保卫学校和智缴北洋溃兵枪械的战斗
1918年4月14日	酝酿已久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正式成立
1918年6月	在一师本科第八班毕业
1920年夏	聘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
1920年8月	创办文化书社
1920年秋	开办湖南一师民众夜学和失学青年补习班
1920年冬	与杨开慧同志在附小结成革命伴侣
1920年冬	成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1月13日	建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6月29日	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8月	开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1年10月10日	建立中共湖南支部，随后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
1922年5月5日	在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大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的两次讲演
1922年冬	辞去附小主事，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第五节 第八班寝室

在第八班寝室，放着被褥、挂着蚊帐的床便是毛泽东当年求学时睡过的床位。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生活非常艰苦朴素，盖的、垫的都是农村的土布，衣服、鞋袜也是破了补补了穿。毛泽东常常穿着那件灰布长袍子，冬天里面加衣，夏天里面减衣，同学们戏说毛君穿衣也有“名堂”——善用加减法。这正是毛泽东清贫朴素、一心求学的真实写照。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总共花了父亲162块大洋，这其中多半用于买书订报，没有其它零花的余地。

即便是在寝室这样的休息场所，毛泽东也不放松对自己和室友的要求。为了引导大家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时事，少去考虑一己私欲，毛泽东在寝室里提倡“三不谈”：一不谈金钱，二不谈家庭琐事，三不谈男女问题。毛泽东认为，“若人生仅以衣食住三者所求，此人生太无价值也。”毛泽东此举当时在全校传为美谈，并被同学们广为效仿。

第六节 君子亭

君子亭位于旧址后面的妙高峰，原名卷云亭，系南宋贤达张栻父子精心营造的城南十景之一。朱张会讲时，这里是张栻、朱熹经常论道的地方。张栻曾写诗赞道：“云生山气佳，云卷山色静。隐几亦何心，此意相与永。”毛泽东当年在第一师范求学时也对卷云亭厚爱有加，常邀学友来卷云亭相聚，或坐而论道，或指点江山。

直到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之前，卷云亭仍是长沙城南市民向往的景点之一。1936年出版的《长沙市指南》曾对它特别加以推介：卷云亭在妙高峰中学之门楼上，城南十景，惟此独存，亭仅方丈，可容三四人坐憩。湘水前横，麓山在望，春夏之间，凭窗西眺，烟波云雾，叠叠重重，在湘滨向麓顶上升，如卷绵蕞，此或“卷云”之名所由来？

“文夕大火”后，长沙许多古老建筑均遭焚毁，卷云亭亦未能幸免。1968年前后第一师范旧址建筑复建时，为纪念1915年毛泽东在妙高峰顶率众修建第一师范运动场，学校在运动场东南侧山坡重建了卷云亭，并更名为君子亭。

第七节 火炬楼

火炬楼建于1969年，占地约2500平方米，座落在第一师范内妙高峰顶，因楼顶安放了巨型电光火炬而得名。在火炬楼顶部四角安放四枝红色电光火炬，寓意着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照耀四方。这是一座宏大的纪念馆式建筑，是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和担任附小主事的经历，缅怀革命师生的丰功伟绩而专门兴建的。火炬楼落成后曾一度在此举办毛泽东生平思想展览，成为长沙市内一处重要的纪念场馆，后改为图书馆。

火炬楼主体建筑呈长方柱体形，为钢筋砖混框架建筑。主体四周有24根巨大方形贴面立柱支撑，大方肃穆；四周墙面为黄色瓷砖；周围有石雕护栏，十级台阶，宏豁大气。主体正面顶部，高悬毛泽东亲笔题写“第一师范”四个大字；八朵巨型葵花装饰图案之下，是毛泽东手书“改造中国与世界”镏字横额；巨幅墙面上，右侧是毛泽东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左侧是“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拾级而上，迈进主楼大厅，左右都有回廊连接环绕，中间天井高阔，给四合式三层楼面提供了充足的光照，同时也突显了舒适实用的建筑特色。

第八节 城南古井

第一师范旧址内有一处与青山相依、被石榴树和玉兰树（徐特立栽植）掩映的优美景点，那就是风姿古朴的城南古井，它是文夕大火后旧址内惟一幸存的原物，弥足珍贵。该水井与附近的白沙井、南沙井、老龙井属同一泉脉，因地处古城城南书院旧址，故名城南古井。该井水深8米，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井水常年不涸不溢。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清晨都来到城南古井进行半个小时左右的冷水浴，一年四季从不间断。毛泽东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强健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磨砺意志，练就猛烈与无畏之精神。

第九节 第八班自习室

第八班自习室在自习楼（又名樱花四合院）的二楼北部。毛泽东爱好学习，非常刻苦。每天清晨，学校还没有打起床铃，他就提前起床。进行冷水浴和六段运动后，毛泽东便迅速走进自习室，朗读他喜欢的国文和历史等有关内容。晚上，同学们入寝后，毛泽东还借着走廊或茶炉间的微弱灯光看书。平时同学们也总见他手上拿着书，与大家谈读书心得，谈社会问题。他经济拮据，买不起新书，就到古旧书店买折价书，还大量地向老师和同学借阅、借抄，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学习何其之用功。

第十节 阅报室

自习楼的西头是当年学校的阅报室，陈列了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期的一些旧报纸。毛泽东当年是这里的常客。课余饭后，毛泽东经常在这里读报，一读就是一两个钟头。在同学们眼里，毛泽东就是“时事通”。一遇到时事疑难问题，同学们就习惯去找他讨论。毛泽东一生重视读报，这一习惯就是在这间小小的阅报室里开始养成的。

第十一节 工人夜学旧址

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阅报室往北，经过学校的天桥，在左侧可看到一片有红边装饰、颇具江南风格的院落，那就是毛泽东当年主办的工人夜学的旧址，也是第一师范原来附设的初级国民小学旧址。1917年10月30日，刚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



研究部部长不久的毛泽东在此成功地主办了工人夜学，这是毛泽东最早的社会实践，为他后来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章 主题陈列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求学湖南第一师范100周年、湖南第一师范110周年校庆。作为湖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重点工程之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旧址进行了整体维修，青年毛泽东纪念馆进行扩馆改陈并更名为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改陈后的主题展览“一代伟人从这里起步”，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工作为主线，以编年和主题内容相结合的方式，较好地把握了纪念馆陈列与校史陈列、青年毛泽东个人与师生集体、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求学经历与求学特色、纪念馆陈列内容与学术研究成果、文物展品与其它辅助展品、纪念馆陈列艺术风格与学校旧址风格、陈列展品与陈列语言等之间的关系。展陈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美观大方，以大量的文物展品、多媒体、幻影成像等现代技术手段，生动地再现一代伟人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从事学习、工作和早期革命活动的光辉实践和独特魅力。

第一节 序厅

本部分概要介绍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主要经历和重要转变，突出青年毛泽东与湖南第一师范的关系，主要是营造声势、强化主题，陈展内容包括青年毛泽东“起步”浮雕像、关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执教及从事早期革命活动史实的中英文简介以及毛泽东分别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同班同学周世钊谈话中关于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深情回忆与高度评价等三个方面。

一、青年毛泽东浮雕

序厅东墙正中是青年毛泽东浮雕，背景是第一师范旧址前楼，背景前面是剃着充满青春之气的平头、穿着飘逸的长袍、右手夹书的青年毛泽东，正意气风发地从第一师范踏步而出，象征着“一代伟人从这里（第一师范）起步”。



二、中英文前言

序厅进门左墙刻有中文前言，右墙刻有英文前言。中英文前言简要介绍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期的学习、工作经历和第一师范对他的重大影响。这里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校学习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起点。在这里，毛泽东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完成了由学生、教员到职业革命家和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三、毛泽东对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深情回忆与高度评价

青年毛泽东浮雕两侧墙上刻有毛泽东对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深情回忆与高度评价。左墙是1936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右墙是1950年毛泽东与周世钊的谈话：“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第二节 源远流长的中华名校

第一展厅名为“源远流长的中华名校”，这是对湖南第一师范的历史渊源、民本教育办学特色等情况的介绍，包括书院教育和师范教育两个部分。

一、千年学府

湖南第一师范是一所源远流长的中华名校，其前身是南宋抗金名将张栻携子张栻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创办的城南书院，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渊源。

城南书院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或议论时政，很快成为“昔贤过化之地”、“湘中子弟争来讲学之区”。特别是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与张栻同为东南三贤的理学家朱熹，从福建专程远道而来，与张栻或在城



南书院或在岳麓书院进行一个多月的讲学论道，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主张会讲”后的城南书院更是声名远扬，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演练场。

为纪念“朱张会讲”千古佳话，褒奖湖南学术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乾隆帝赐匾“道南正脉”，该匾长期同挂于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大堂门庭。道光皇帝曾题写“丽泽风长”，御赐城南书院以示褒奖，但该匾现已不存。

走进古色古香的城南书院大堂门庭。就来到了千年学府部分。在展厅的左侧，陈列有城南书院的地形地貌图、清代著名书法家祁俊藻撰写的《城南书院秩序》及朱张渡的照片，在展厅的正面摆放有仿制的“道南正脉”匾额，从这些展品中可以了解到当年城南书院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

而位于展厅正中的清代城南书院沙盘模型，则可以看出，当时书院布局宽敞，环境优雅，办学已经有相当规模。据记载，书院鼎盛时，有学子三千多人。

自南宋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城南书院名人辈出，群星灿烂。湘军首领曾国藩、爱国名将左宗棠、民主革命家黄兴等都曾在此求学或者藏修，据不完全统计，城南书院时期师生收录入辞海的达14人。在展厅正面的展墙上对城南书院时期的杰出人物进行了介绍。

二、百年师范

第一组“旧书院成了新师范”。1903年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是湖南第一师范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至此不仅标志着城南书院的历史使命的结束，也标志着第一师范的诞生。

在这一时期，有三位校长功不可没，他们是：王先谦、谭延闿、孔昭绶。王先谦引进了一些西方课程，从形式上开创了由旧书院改制为新师范的局面。谭延闿倡导新式教育，引进全套日本学制，使学校实现了由封建教育向民主教育的转变。孔昭绶孔昭绶采用欧美各国的教育经验，实行中西合璧的民本主义教育，他本人也被誉为“民本教育的先驱”。1951年8月，毛泽东评价说：“何止民主教育家，还是一位教育改革的先驱。”

本展厅展出的重要文物资料有1903年至1904年间的湖南全省师范学堂界碑；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易名为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后的教职员合影；1912年时的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全景。在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教职员合影中，老师们穿着清代的官服，戴着清代的官帽，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校是

一所官办的学校。而从1912年的湖南公立学校全景照片，可以看出和1968年复建后的校园建筑风格、布局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组：“三育并重的民本教育”

本部分重点介绍了湖南第一师范早期推行的民本主义教育。围绕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展陈了旨在“唤起学生讲学兴味，并涵养其高尚之思想”的校歌；“代表第一师范之徽识”、旨在“唤起学生爱校心”的校旗以及制服、制帽等仿制件；毛泽东同届学生黄受松捐赠的《伦理》《物理》听课笔记；体现第一师范早期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德、智、体及实践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一组照片，包括1914年学监主任方维夏学生整装外出采集标本、学生野外演习、1916年学生课外劳动会分组修辟操场、一年级学生上体育课等内容。这些展陈的文物和仿制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湖南第一师范民族主义教育的理念和办学效果。

而用铜板雕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民本主义教育教育方针的图解，则很好地诠释了当时学校民本主义教育的内涵。

校训以知耻为中心，贯彻公、诚、勤、俭。

课程设置上，以德育为首，辅以体育、智育以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农、工、商各科实习。在人才培养上，注重“三育并重”“身心并完”，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同时，在孔昭绶校长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学校将军事训练也纳入了体育课程。虽然当时第一师范是一所培养小学老师的师范学校，但是特别注重培养学生树立远大志向，成为万夫之雄的人才。这些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科学和全面的，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仍有积极意义。

第三节 走出乡关 励志苦读

第二展厅陈展介绍毛泽东早年的求学历程和学习方法，包括“走出乡关 求学师范”和“励志苦读 博闻强识”两部分，前者介绍青年毛泽东立志出乡关、成为师范生的历程，后者介绍青年毛泽东独特的学习方法、游学读无字之书等内容。

一、走出乡关 求学师范

本部分陈展三组内容。

第一组是“立志出乡关”。

该部分介绍了毛泽东从八岁开始在韶山断断续续读了五年的私塾，到后来读到《中国又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盛世危言》等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书籍，唤

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烈责任感，1910年，走出相关，到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的历经。

第二组是“长沙求学路”。

介绍了毛泽东在入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前的一段曲折求学路。在东山小学读了半年后，1911年春，毛泽东在贺岚岗老师介绍下考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半年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湖南新军。1912年3月，毛泽东以为革命成功，决定退出新军，继续求学，并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半年后，毛泽东认为学校校规太严苛，课程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便决心退学。

1912年秋至1913年春，毛泽东制定了一个自学计划，每天到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毛泽东认为，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这半年“对我极有价值”，从此，博览群书成为毛泽东的终生爱好。

在该部分，展陈了一幅醒目的油画，画中一位衣着朴素的青年，静静地注视着在世界坤舆大地图。这里描绘的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第一次见到世界坤舆大地图的情景。世界坤舆大地图让这个从韶山走出的农村青年，开阔了眼界，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之大，并从韶山那么小，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民众联想到全世界、全中国有众多少受苦受难的民众需要解救，从而在心中升腾起“要为全世界、全中国痛苦的人贡献全部力量”的宏伟志向。

第三组是“成为师范生”。

1913年春，毛泽东结束了半年的自学生涯，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与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合并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随之编入第一师范预科三班学习，后相继被编入二级三班、师范一部本科八班。该部分展陈了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6、7、8、9班的毕业合影、第八班的毕业合影，1915、1916年教职员工一览表等记录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珍贵文物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展柜里展出的毛泽东同期毕业生黄绶松的毕业证书，尽管毕业证不是毛泽东本人的，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唯一获得的正规文凭的是个什么样子。

二、励志苦读 博闻强识

第一组：“积久成学贵有恒”。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刻苦求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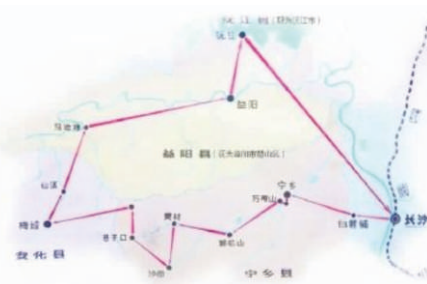
班教室、第八班自习室、阅报室、学校后山的君子亭都留下了他孜孜不倦的身影。同时他特别注重学习的持之以恒，为此，他还撰写了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同时，在毛泽东1917年夏天为同学萧子升学习笔记本《一切入一》题写的序言中，也深刻论述了学习在于持之以恒的道理。

为了培养自己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学习的能力，毛泽东还他经常去喧闹的南门口看书，在该展厅的《闹中求静》场景中真实地还原了毛泽东当年在商贾云集、攘来熙往的南门口读书的情景。

第二组：“不动笔墨不读书”。

毛泽东特别推崇徐特立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注重读、思、写三者合一，使所学的知识内化于心，成为自己的东西。在第一师范求学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在书边空白处或笔记本中写了不少于百万字的批语、评注。《伦理学原理》是一部西方哲学著作，该书约十万字，毛泽东读后在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显示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中强烈的独立思考精神。在该部分的展墙上展出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手抄的《离骚》文照；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文照。展柜里有毛泽东1914年听杨昌济、袁吉六老师讲课时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从这些字迹清秀、工整的课堂笔记和密密麻麻的批注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的治学态度。

第三组：“读无字之书求真知”。毛泽东认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于是，毛泽东多次采用“游学”的方式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借以了解社会，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1917年暑假，他和同学萧瑜（即萧子升）以“游学”的方式，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进行调查，行程近千里。返校后，毛泽东致信老师黎锦熙，对改革社会、变换旧思想道德以及开发民智和立志探求真理等问题，都提出了他的见解，并认识到必须用真理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从而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



青年毛泽东1917年游学路线示意图



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毛泽东（1917年）

第四节 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一、文明其精神

第一组是“探求人生真理”。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强调要立真志，先要求得真理。只有“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掌握了宇宙世界的“大本大源”，才能算是真立志。毛泽东曾到船山学社听演讲，利用暑期到岳麓书院寄读，并常到爱晚亭读书、讨论问题，从湖湘文化中寻求人生真理。同时，毛泽东积极从西方思想文化中探求真理，认真研读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著作。毛泽东在探求人生真理的过程中，对中西思想文化提出了“东西方文化应该同时改造”的独特见解，体现了他强烈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

第二组是“关心国家民族命运”。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经常引导同学多关心国事，多讨论学问，少谈身边琐事、男女、金钱等问题，他以身作则，在寝室恪守“三不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非常关心时事，每天到学校阅览室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掌握各种社会思潮的动态，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并称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激愤。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编印的补充教材《明耻篇》上奋笔题词，表达以雪耻救亡为己任的学子抱负。1915年3月，与毛泽东交往甚密的易咏畦同学因病去世，第一师范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作了这首五言挽诗，既悲悼朋友之早夭，又深切表达了对民族危难的忧虑。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表现了毛泽东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时事研究之精深。

二、野蛮其体魄

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非常注重体育锻炼。冷水浴是毛泽东锻炼身体和磨砺意志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当年常在学校水边进行“冷水浴”。毛泽东当年常和蔡和森等同学利用假日到橘子洲头、南湖港、岳麓山一带讨论时事，并进行游泳、爬山、露宿、风浴、雨浴等体育活动。

1917年4月，毛泽东以“廿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对体育锻炼作了理论上的论述。在文中，毛

泽东提出了奋斗向上的人生观，提倡武勇世风，并论述了体育活动的作用和方法。他还针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提出了“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的主张。并根据自己多年锻炼的实践，总结创造了“六段运动”，刊载于《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该展厅展出有《六段运动操》示意图和多媒体播放的真人示范《六段运动操》，观众可以在此观看和学习。

第五节 尊师结友 勇于实践

第四展厅包括五大内容。第一部分为“尊师结友”，介绍第一师范名师对毛泽东的熏陶和益友之间的砥砺。第二部分为“学生实干家”，介绍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组织护校、人物互选等内容。第三部分介绍毛泽东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组织出国留学内容。第四部分为“湖南五四运动领袖”，介绍毛泽东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等内容。第五部分为“附小主事兼师范部国文教员”，介绍毛泽东主持第一师范附小工作和担任师范部国文教学等内容。

一、文明其精神

第一组：“名师熏陶”。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有幸得到了一批名师的悉心指导和精心栽培，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是：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

杨昌济1913年春至1918年夏任第一师范修身与教育学教员。他学贯中西，道德高尚，思想新锐，是毛泽东等青年的楷模和人生导师。徐特立1913年至1919年，任第一师范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他提倡的“不动笔墨不读书”以及注重实践的思想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黎锦熙1914年至1915年夏，任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毛泽东经常向他请教“读书方法”、“改造社会”等问题。除了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三位老师外，还有一些老师对毛泽东也有较大影响，如袁吉六、罗元鲲、张干、孔昭绶、易培基、方维夏、王季范、王立庵。匡互生虽不是毛泽东的老师，但作为当年实际主持第一师范工作的教务主任，他对毛泽东破格担任师范部国文教员有知遇之恩。

第二组：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救国救民于水火，单凭一己之力或少数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砥砺，共同提高，一起奋斗。所以，毛泽东在1915年夏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长沙多个学校发出了油印的《征友启

事》，邀请那些热爱祖国、能吃苦耐劳、有决心为祖国牺牲的青年做朋友。相关陈展物品有：《征友启事》组合陈列，包括《征友启事》文抄、毛泽东1915年致黎锦熙信关于征友启事一事的文照。

此后，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毛泽东身边就聚集了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瓚、张昆弟、陈昌、罗章龙等20多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成立了一个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为建党建团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二、学生实干家

毛泽东非常热心社团活动。1915年11月当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文牍后，学友会各种重要文告大多出自毛泽东之手。任学友会文牍期间，毛泽东显露出出色的组织才干。1917年下学期，经学监主任方维夏推荐，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主持学友会工作，开创了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由学生担任的先河。学友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各项课外活动生气勃勃，空前活跃。与此同时，毛泽东积极组织学生课外志愿军开展护校工作。1916年秋，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为实施军国民教育而组织的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为宗旨的学生课外志愿军，任第I连直属连部上士。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毛泽东还担任递承上级命令和本连一切文牍事物的工作。1917年11月18日，还成功组织了生平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猴子石缴枪。1918年4月，为防止进入长沙的军阀部队对学校的扰乱破坏，毛泽东以学生课外志愿军为基础组成警备队，并任队长，率队护卫学校，直到6月顺利毕业。

第一师范学校附近聚集着铁路工人、船运工人、人力车夫、小商贩及其他劳动者，他们生活贫困，工作条件恶劣，大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毛泽东主持第一师范学友会的工作后，投入大部分精力满腔热情地主办了工人夜学。从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工人夜学招学广告、到工人夜学的管理，毛泽东都亲力亲为，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毛泽东也获得了最初的社会实践经验。

在展厅里，还展出了毛泽东的一份教案。这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附小教学实习教案。同学李端绶对这次实习评价很高：“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

在良师益友的熏陶、砥砺下，毛泽东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从第一师范众多青年才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先进青年中的杰出代表。早在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先生就在日记中盛赞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黎锦熙先生也在日记中称赞毛泽东“大可造就”。毛泽东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敏锐的思维、非

凡的胆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出类拔萃的才华，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与喜爱，成为全校师生所公认的品学兼优的佼佼者。1917年6月，全校学生举行“人物互选”。在当选的34人中，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方面都有得票者唯他一人，“言语”“胆识”两项也只有他一人得票。

三、成立新民学会 组织出国留学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较早成立的进步社团之一。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长沙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家成立新民学会，通过了由毛泽东、邹鼎丞起草的会章，规定了学会宗旨、会员守则、入会条件等十一项条文。1919年，新民学会会员发展到五十几人，其中许多会员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

毛泽东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出了新民学会必须“向外发展”的方针。1918年6月，新民学会委派蔡和森专程到北京筹划湖南青年赴法事宜。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与蔡和森等8人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房间狭小，一行人“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他一边工作一边听课，眼界大开。1919年3月17日，首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89人从上海启程，其中湘籍学生43人。在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1919年至1920年，湖南赴法学生达400余人，占全国赴法学生总数的1/4，成为全国赴法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中新民学会赴法会员达18人，占当时会员总数的近1/3。新民学会通过组织出国勤工俭学，部分会员前往法国、俄国、日本、南洋等地。他们广泛了解和深入研究世界革命形势，学习各国革命经验和先进思想，一部分会员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以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四、湖南五四运动的领袖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25日，毛泽东等在楚怡小学召开长沙各校代表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运动。1919年5月29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毛泽东经常前来指导。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中评价这篇文章说：“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

当今的重要文字。”《湘江评论》被军阀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紧接着主编《新湖南》，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

1919年11月16日至28日，毛泽东就长沙赵五贞不满父母包办婚姻在花轿中自杀事件，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9篇文章，对封建婚姻制度、妇女解放问题做了一番扎扎实实的分析研究，激励人们奋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会。

1918年3月，皖系军阀张敬尧任湖南督军兼省长。督湘期间，他纵兵烧杀抢掠，民怨沸腾。1919年12月，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与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领导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19年12月初至次年4月上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驱逐督军张敬尧请愿团到北京请愿，第二次来到北京。在北长街福佑寺，毛泽东组织平民通信社，发出大量驱张稿件、通电、宣言等。“驱张”代表分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造成举国声讨的浩大声势。1920年6月26日，张敬尧率部仓皇逃离湖南，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取得胜利。

五、附小主事兼师范部国文教员

1920年秋，毛泽东由北京返湘，应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之聘，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校长）。毛泽东任附小主事期间，撰写了一副对联“联世界是我们的 做事要大家来”，勉励师生当家作主，办好学校。毛泽东在附小工作期间，积极进行教育改革，使附小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921年春，毛泽东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创办了“成年失学补习班”，使贫苦工农子弟能够上学。毛泽东还经常邀请有学问的人来校讲演，在展陈的许志行的回忆文章《毛主席教我学语文》、谢觉哉向学生讲述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讲演记录中都生动记述了毛泽东在附小期间的工作情况。在毛泽东引导下，任弼时、毛泽民、毛泽覃、廖沫沙等一批附小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

第一师范附小不仅仅是毛泽东事业的起点，同时也是他家庭生活的起点。1920年冬天，毛泽东和杨开慧就是在第一师范附小不足10平方米的主事室——办公室兼卧室，举办了极其简朴的婚礼。没有花轿，没有喜宴，不做俗人之举，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1930年11月，杨开慧壮烈牺牲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悲愤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21年下学期，毛泽东兼任师范部第二十二班国文教员。他亲自编写教材，节选《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结合实际向学生讲授。其授课语言流利，

感染力很强，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指导师范部萧述凡、郭亮等进步学生组织“崇新学社”，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

第六节 建党革命 亲切关怀

一、确立信仰 建党革命

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曾和蔡和森等人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准备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后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而中断。1919年，回湖南后，毛泽东仍然认为岳麓山一带是实施新村建设最适宜之处。他还发表了《学生之工作》一文，以期得到社会的关注。

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这两篇文章，深受影响。1949年毛泽东十分感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著作。他后来回忆说：这三部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此外，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36年，在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我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1920年9月，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文化书社在长沙市潮宗街开张营业，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文化书社与全国60多个出版发行单位建立了联系，在湖南省内7个县市设立了分社或代销部，发行进步书刊150余种，还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为“信用介绍”。毛泽东、易礼容等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大量销售进步书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

为正确认识俄国十月革命的本质，澄清封建军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不实宣传，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新民学会骨干会员发起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发动青年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组织赴俄勤工俭学中起了重要作用。经俄罗斯研究会组织介绍，进步青年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赴俄勤工俭学。1920年3月，夏明翰在衡阳组织学生、民众响应“驱张运

动”。运动成功后，同年秋来到第一师范结识了毛泽东，加入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阅读了马列主义和有关十月革命的新书刊。1921年8月，在毛泽东等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任职，由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红色绝唱，英勇就义，年仅28岁。

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极力想将新任督军谭延闿发起的湖南自治运动转变为湖南人民的自治运动，实现他构想中的湖南共和国。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放弃了对社会改良道路的最后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1920年底开始，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罗章龙等人的多封书信中，明确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1921年1月1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新年大会。到会的19名代表中有16人主张将学会方针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

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建党理论和步骤，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作用和指导思想。他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些观点，为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表示，对蔡和森提出的建党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没有一个字不同意”。

在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第一师范第22班学生张文亮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1920年冬的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指示建团的情况。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16人，7月份发展到39人。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何叔衡代表中国共产党湖南早期组织，从第一师范附小出发，奔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在1921年6月29日日记中，谢觉哉记载了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情形。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会议最后一天（31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毛泽东被推举做会议记录。

1921年8月，回到长沙的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等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为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学校在

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革命干部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随即，毛泽东着手湖南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工作。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组建，书记均为毛泽东。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均为全国最早的省级支部和省级党委。1921年冬，毛泽东辞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职务，搬到清水塘居住，以第一师范教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领导中共湖南支部和组建中共湘区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湘区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区之一。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第一师范礼堂召开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讲演。1922年冬，毛泽东辞去第一师范教职，全力以赴从事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相关陈展物品有：毛泽东半身像，1922年6月毛泽东给团中央的信复制件，中央局1922年10月就建党、建团等四大问题向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作出统一部署的通告复制件，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旧址照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报道文照。

二、群星灿烂 名人辈出

第一师范名人辈出，近代以来更是群星灿烂。据初步统计，第一师范师范教育时期入选《辞海》的师生有41人，城南书院时期入选《辞海》的师生有十四人，第一师范师生校友中入选《辞海》的名人名家达五十五人以上。一个学校入选《辞海》的名人名家校友如此之多，这在全国高校都非常罕见。

三、亲切关怀 继往开来

解放后，邓颖超、李锡铭、耿彪、杨得志、李锡铭、宋任穷、宋平、贾庆林、尉健行、李岚清、李长春、李铁映、王兆国、刘延东、彭佩云、盛华仁、毛致用、路甬祥、蒋正华、徐匡迪、刘晓峰等数十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曾来湖南第一师范视察，十多位外国政要曾来此访问，主席家人李敏、李讷、邵华、毛新宇等曾来此缅怀。毛泽东多次以书信、电报和题写校门、校训等方式对母校给予了亲切关怀，江泽民为青年毛泽东铜像题字。

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全体教职工的不懈努力下，第一师范健康、快速、持续地发展。学校已于2008年升格为普通高等教育本科院校，并在河西新建了一个占地一千余亩地的东方红校区，在校师生将近两万人。第一师范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第三章 辅助陈列

毛泽东当年听课学习的第八班教室旁边的四合院称为第八班教室四合院，或者叫前四合院。与此相对应，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第八班寝室所在的四合院称为第八班寝室四合院，或者叫后四合院。在第八班寝室四合院，设有辅助陈列展厅四个，即场景再现“猴子石缴枪”；红色影视厅；“毛泽东诗词鉴赏”展厅；场景再现（幻影成像）“读无字之书”厅。同时，第八班寝室四合院坪中塑有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教授书刻“名师熏陶 益友砥砺”的大理石碑一块，师生交流青铜群雕3组，共塑铜像11尊。除了第八班寝室四合院辅助陈列，还有妙高峰山顶辅助陈列，包括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和青年毛泽东成长足迹汉白玉浮雕花园。这些辅助陈列从不同角度，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青年毛泽东的求学励志、社会实践及早期革命等光辉事迹。

第一节 千年学府 丽泽风长

一、师生交流青铜群雕组合：名师熏陶 益友砥砺

第八班寝室四合院中间有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樟树。在樟树四周，北侧矗立由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亲书的师生交流群雕组合主题——“名师熏陶 益友砥砺”，其余三边是三组11尊青铜雕像。南侧群雕包括杨昌济、黎锦熙与毛泽东、蔡和森等3名学生，东侧群为徐特立与张昆弟等2名学生，西侧群雕是国文教员袁吉六与2名学生在交流。

二、场景再现（幻影成像）：猴子石缴枪

该场景位于第八班寝室四合院南部，这是本基地面积最大的一个辅助陈列展厅，讲述的是毛泽东带领学生志愿军智取三千名北洋败兵的故事。在展墙的一侧，通过四幅大型浮雕，展现了当时学校开展军国民教育，学生志愿军开展军事训练的画面。主展示区，以雕塑和画面配以声光电，当战斗开始时，枪声、呐喊声、鞭炮声营造猴子石缴枪的战斗氛围，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生动地演绎了毛泽东生平第一次传奇的军事行动——猴子石缴枪的故事。

三、红色影视专题：毛泽东与第一师范影视作品

本基地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校，是三位一大代表的曾求学或从教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很多内容与第一师范密切相关。

第一师范的校舍环境是不可多得的融中西文化于一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因素使湖南第一师范成为影视作品、特别时红色影视作品的拍着基地。2004以来《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建党伟业》《风华正茂》《湘江北去》等一系列红色影视作品相继在湖南第一师范旧址拍摄，这些多方位地、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青年毛泽东的光辉业绩的影视作品，通过中央电视台和湖南卫视等的播映在全国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激发了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奋斗精神。《建国大业》《反腐枪声》《青春激荡的年代》《长沙保卫战》主旋律影视作品，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永远的军魂》等纪录片，也在这里取景拍摄。现在，这里成了影视拍摄基地和全国旅游热点景区，更加声名远扬。

在第八班寝室四合院东南角，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特设有红色影视专题辅助陈列展厅——“毛泽东与第一师范影视作品”，陈展了《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建党伟业》《风华正茂》《湘江北去》《建国大业》等与毛泽东和第一师范有关的影视作品的剧照，并通过多媒体投影仪反复播放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以对来馆参观、学习的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进行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2007年火爆全国、影响深远的红色经典青春励志偶像电视连续剧《恰同学少年》。该剧是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历时四个多月拍摄而成的，它以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五年半的读书生活为主要表现背景，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优秀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习、生活及其纯美情感，同时塑造了杨昌济、孔昭绶等一批优秀教师形象，深刻揭示了“学生应该怎样读书，教师应该怎样育人”这个与当今社会紧密相关的现实主题。该剧在央视一套首播时创下同期全国电视剧收视率第一的热潮，使得第一师范这所“千年学府，百年师范”愈发显得神圣、庄重、深邃，其千年积淀的湖湘文脉、百年锻造的红色精神，顿时井喷般辐射全国，影响巨大。

四、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诗词：毛泽东诗词鉴赏

毛泽东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当代杰出的大诗人。陈毅称他为“诗坛盟主”，柳亚子则以“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形容其诗词。青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就爱好诗词，与同学朋友即有诗词唱和，或对亲友送别、悼亡之作。此后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建设时期，即便在戎马倥偬和日理万机中，依旧保持着吟诗作词的爱好。

本展厅以多媒体播放的形式展现毛泽东公开发表的120多首诗词，陈展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28首诗词，包括《儿歌·应舞狮》（1902年正月）《七绝·咏蛙》（1910年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春）《四言诗·祭母文》（1919年10月8日25）《新体诗·颂赵女士的人格》（1919年11月18日）《虞美人·枕上(赠杨开慧)》（1921年27）《贺新郎·别友(赠杨开慧)》（1923年28）《沁园春·长沙》（1925年）等。早期这些诗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青年毛泽东的学习、实践及思想，所谓诗言志也。

五、场景再现（半景画）：读无字之书

本场景通过虚实结合的半景画，声光电等多媒体手段，生动地再现了1917年毛泽东和肖子昇的一段“游学”经历。

第二节 妙高峰山顶辅助陈列

一、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

在旧址后山妙高峰，学校1998年新建的运动场，树立着一尊青年毛泽东铜像。这是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湖南第一师范聘请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叶山教授设计、南京某公司铸造了一尊青年毛泽东铜像，并将其矗立于火炬楼前。铜像高5米，大理石底座高4.3米，共高9.3米，寓意1993年。铜像取“一代伟人从一师起步”的行进姿态，体现了青年毛泽东“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气度。铜像底座镌刻着江泽民主席题写的“青年毛泽东”字样，背面刻有湖南第一师范杰出校友李维汉之子、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题写的近 400字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碑文。后来，因教学用地需要，湖南第一师范将青年毛泽东铜像迁至新建教学楼南边侧的操场北部，新建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湖南省主要党政领导以及毛泽东主席家属毛新宇等，曾出席在此举行的有关活动。青年毛泽东铜像塑立以来，湖南第一师范和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年年在此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等活动，不少长沙市民和外地游客也常来此祭拜祈福。

二、青年毛泽东成长足迹汉白玉浮雕花园

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各界捐资在火炬楼前塑立青年毛泽东铜像，建成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同时，在火炬楼前草坪修建汉白玉浮雕八座，

宣传青年毛泽东的革命追求与光辉业绩，为火炬楼添景增色。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内老图书馆与教学楼之间，塑有由8块16面汉白玉浮雕组成的青年毛泽东成长浮雕群，并建成了花园，生动地反映了毛泽东在一师成长的足迹。

第二篇 主题内容

第一章 文明其精神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五年半时间，是他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里，毛泽东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蓄能，这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相当的提高，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节 修身立志，探求真理

毛泽东早在少年时期就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909年前后，他在读了《盛世危言》（插图一：《盛世危言》）和《列强瓜分之危险》之类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和维新色彩的书后，身处偏僻山村的少年毛泽东顿觉耳目一新，书里提出的救国救民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还记得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插图二：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救国救民的思想在这时开始萌芽，开始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担忧。

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命感的感召下，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满腔热情地参加了湖南革命新军，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之中。

1912年，毛泽东退伍之后，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半年里，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极大地开拓了他的世界眼光与民主启蒙思想，使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坤舆大地图》，这使他联想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人民的疾苦，感到青年改造社会的艰巨任务。从这时候起，他就决心要为全中国苦难的人、全世界苦难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开始。至此，跨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五年半内，他的这个志向更加坚定明确。他与志同道合

的同学常引用顾炎武的信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严肃地“以天下为己任”，互相勉励要成为“栋梁之材”。因此，无论是对待社会、国家、世界，还是家庭、学校、师生关系，各个方面都表现了他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坚决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追求真理、除旧布新的思想。

在一师求学期间，这时的中国正是辛亥革命后极端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受杨昌济等老师的影响，青年毛泽东更加心忧天下，他忧国家的政治腐败，忧国家的主权不独立，忧国民的思想太陈旧等等。他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如何改变，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

他号召青年要树立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民族的志向。

当时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比如将来当军事家的、政治家的、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简单的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毛泽东在1915年给肖子昇的信中提出求学有“为人之学”、“为国之学”、“为世界之学”三重境界。由此可见，心系社会、苦学励志是当时毛泽东的自我设计。

因此，他学习方向更明确，学习意志更为坚定，决心“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誓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精神，持续勤学苦练。

毛泽东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他还认为“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必须刻苦攻读。

为此，他与朋友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关心和谈论的应该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他说：“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吾辈必想一最容易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而“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毛泽东要求自己并鼓励同学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努力准备；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

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他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奇杰”何在？“奇杰”就在那些满怀救国抱负，而又潜心学习的“有专之士”中。但“奇杰”，也终非圣贤，单凭个人的奋斗，并“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为此，毛泽东毅然“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以便作共同、长期之奋斗。

他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并从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得出了救国必须有本领的结论。本领从何而来？只有学习。“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不厚，时惧倾圮。”

救国从何下手？学习主要学什么？他认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救国要立足于人民，立足于人心，要用“大本大源”，去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那么“本源”是什么呢？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号召，天下之心其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毛泽东后来说：“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以后，他不停地探索宇宙、世界和人类的真理，不懈地追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直到1920年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

第一节 修身立志，探求真理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正是清王朝刚刚覆灭，共和初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复辟反复辟斗争异常激烈，南北军阀不断混战，民不聊生。

毛泽东特别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天天阅读省内外各种报刊。他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了。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除了自己订阅报刊和到学校阅报室阅览外，还经常向人借阅报刊。如《甲寅》杂志就曾在一位姓徐的先生处借过。徐离去后，他为续读《甲寅》11、12两卷，曾于1916年1月28日、2月19日两次致函萧子升，告之“欲阅甚殷”，托

萧子升以自己的名义“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毛泽东看报也与众不同，常常随身带笔记本、地图和英汉字典三样东西。根据报刊内容提到的地名，查看地图，疑难字查看字典，凡重要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必定从头至尾看完，并作出摘记，写上心得。对于自己订的报纸，还将其重要资料剪下来，积久便装订成册。有时他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上报文中的主要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称，并注出英文。同学们觉得奇怪，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这是一举三得，既明了了时事，又熟悉了地理，还可学习英文。（插图五：笔记本、地图和英汉字典照）

正因为如此，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人们一般都议论纷纷，常常困惑不解，然而毛泽东却看得非常清楚，而且还能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得精辟入理。因此，被同学们誉为“时事通”。大家有什么不明的问题，就找他。一些很难琢磨的问题，经他一分析很快就得解决。

萧三回忆说：那时我是天天看报的，我每次到阅报室时，差不多都遇见了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但没有交谈过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从街上回学校，恰好和他走在一起。我们边走边谈，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怎样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参战之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话有时间、有地点，有充分的根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同样天天看报，他分析得那样透彻清楚，我却一点也说不出。

毛泽东还经常就一些重大的时事问题，如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抵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等，向同学们发表演讲。他那富有感染力和鼓动性的话语，使大家时而兴奋，里面激昂，时而愤怒。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在杨昌济、袁仲谦、黎锦熙等教师的影响下，他比较系统地接受了爱国主义理论教育。在他的《讲堂录》中，就记有王船山关于民族至上的“三义”思想“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还记有：“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深刻地揭露了人民的悲惨境遇，以此唤醒国民对亡国灭种之难的警觉。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及最后通牒，第一师范师生对此群情激奋，编写了《明耻篇》一书。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下这样的誓词：“五

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爱国之情，跃然纸上。（插图六：《明耻篇》）

1917年7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对当时湖南、全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论述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他对中日关系的分析，极为精彩。他从“日俄协约”，谈到日本政局不稳定的问题，谈到当时日本驻中国的“公使有急报归国”及日本“大隈阁有动摇”之传闻。大隈重信于1914年再次出任首相，第二次组织日本内阁，曾胁迫中国政府接受旨在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时他极有可能下台，中国不少人对可能出现的日本新内阁抱有幻想。毛泽东则尖锐地指出：“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本诚我国劲敌！”他对中国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的严重局势十分悲愤。他预计“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但是我“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他又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因此，他希望萧子升多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其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之情，昭然笔下。

毛泽东对时事极为关注，并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当时很多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什么都比中国好，中国什么都要向西方重学。毛泽东则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在1917年的信中尖锐地指出：不少人讲“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对于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我们要有“自己真正主张”，不能“盲从他人”，不能被人“所利用”，而“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

第二章 积久成学恒有贵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他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在中国和世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伟人，其中之一是得益于他孜孜不倦的读书和学习。他曾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而他嗜书如命，手不释卷，以书为伴的学习精神更是贯穿了他的整个学生时代。

第一节 励志苦读，博闻强识

1913年春，毛泽东以作文满分的成绩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由于学校初办，房屋破旧，居处拥挤，既无宽敞的活动场地，又无丰富的图书资料，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许多同学对此很不满意，经常发牢骚、讲怪话。毛泽东则与众不同，他认为学习虽然要有一定的条件，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假如自己学习不认真、不刻苦，即使条件再好，也不一定学得好。他不仅自己刻苦攻读，而且还引用车胤“囊萤”、孙康“映雪”一类故事，启发和激励同学们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努力学习。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是当时长沙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它的规模、设备特别是师资，也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而且学生免交膳宿费，就连书本费和服装费也由学校包了。学习条件好了，毛泽东更是以非凡刻苦的精神学习，从不虚度光阴。从1915年冬他致萧子升信谈到自己的“五段课程”可见一斑。

所谓“五段课程”，即是将一天作五段安排：早晨读英语，上午八时至下午三时上讲堂即教室，下午四时至晚饭前习国文，晚上复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一小时。

每天清晨，学校还没有打起床铃，毛泽东就提前起床，照例进行冷水浴和“六段操”后，便迅速走进自修室。这时室内还辨不清字迹，他就站在窗户旁边，迎着熹微的晨光，朗读他所喜欢的文学或英语。

上课时，他或正襟危坐，专心倾听老师讲解，或聚精会神地钻研自己需要研究的问题。午后或空闲时间，常到图书馆去借阅书刊或到阅报室去看报。晚餐后，照例邀集一些同学外出散步，互相交换一天的学习心得，讨论时事问题。一到晚上，便集中精力，认真钻研社会科学。每当夜深人静，同学们已进入梦乡，他还常在走廊上或茶炉室的灯光下看书。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废寝忘食。

毛泽东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后来精心研究哲学。对于文学，他有很深的爱好，曾仔细研读过《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诗经》和《楚辞》等，也喜爱孔融、陈同圃、叶冰心等人的文集。因而无论是对古体诗词，还是对于古体散文，他都作得很好。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被赞誉为“立试万言，倚马可待”，往往被老师批上“传阅”，贴在事务室外面的走廊上。对于中国的书法，他很感兴趣。有一段时间，他曾天天练碑帖，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他认为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

毛泽东重视研究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些书籍因为一时难以买到，就一本本全文抄下。毛泽东的同学罗学瓚1917年9月26日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史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至今阅毕。”仅西洋伦理学史一科，手抄本就达七本之多，可见毛泽东当时在学习上所下功夫之深。

毛泽东的国文老师袁仲谦为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他劝毛泽东多读古文，特别是韩愈的文章。于是，毛泽东下功夫读了《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毛泽东从旧书坊买回一部《韩昌黎文集》共二十多本，认真选读其中的好文。据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得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第二节 别具一格的学习方法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还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这为他日后成就大业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第一个读书方法就是“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毛泽东的恩师徐特立先生提出来的，毛泽东对这种学习方法极为推崇。

什么叫“动笔墨”？就是不能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一定要经过自己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

他在一师求学五年半的时间里，所写的《讲堂录》、《随感录》、《日记》和摘抄本就有一大网篮，这些笔记是他辛勤学习的成果，他非常爱惜，毕业后随身从船山学社，带到清水塘，后来又带回韶山老家。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族人为了防止反动派的迫害，把他放在家中的全部书记、日记和笔记本搬到屋后的山里烧毁了，只留下了两本教科书和一些读书笔记的残页。

《讲堂录》是毛泽东用直书九行纸本所写的笔记，共47页，94面。前11页，毛泽东用工整秀逸的小楷字，手抄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后面36页是课堂笔记，所录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词、句、段等文字400条，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等，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代表作和代表人物，都有记载。还有许多处评价历史、政治和人物、事件，间杂

以他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和议论，很有个性和见地。

仅存的这本读书笔记，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对知识的辛勤采撷吸收和思想价值观念的取向，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他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虽然今日已很难寻觅毛泽东当年具体的读书生活，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讲堂录》看到他读书学习的功夫和心得。

毛泽东提倡积久成学的治学方法。1917年夏天，毛泽东好友萧子升将自己的读书札记装订成册，取名“一切入一”。应萧的请求，他在上面题词道：学问的研究，“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深刻论述知识学问在于积累的道理，无疑是他自己学习实践的经验总结。

关于恒与不恒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还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善于吸取他人之长，养成了勤学好问的习惯也是毛泽东非常独到的学习方法。他常说：中国人把学问两个字连成一个词很有意思。学问学问，就是好学好问。一个好学好问的人，才能真正有学问。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也一定是一个虚心好学的人。所以，他不论是读书听课，还是看报刊杂志，凡是不大明白的地方，从术语、名词、典故，到理论逻辑和思想内容，都要记下来，以便随时向别人质疑请教。

毛泽东非常尊重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进步教师，虚心向他们请教。他经常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日记送给他们看，征求他们的意见。

其中，他最敬仰杨昌济的学问和品德，深感杨昌济“弘通广大”，因而对杨先生“最所佩服”。1913年他在四师听过杨先生的修身课，1914年进入一师，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一个哲学小组，便请杨先生担任指导。1916年暑假，毛泽东从长沙步行120里，专程去板仓杨家拜访。他以极大的兴趣浏览杨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新书和报刊如获至宝，废寝忘食地同杨先生讨论学术和社会问题。

杨昌济学贯中西而以中为主，这明显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杨昌济特别推崇宋儒的心性之学和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以及曾国藩、谭嗣同，也同样明显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杨昌济对康德哲学的研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哲学信仰。

有一次，毛泽东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

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毛泽东只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了他的那篇文章，给打了一百分。一百分是满分，据说，杨先生还给他加了五分，充分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鼓励和赞赏。

毛泽东学习的另一个特点是独立思考，批判地继承。他认为，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和中西学说，不可不加分地兼收并蓄，应该有分析，有批判。他常对同学们说：古人的话，教师的话和一切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应该摒弃，囫圇吞枣的办法最要不得。

他研读《韩昌黎文集》时，从中选出一部分比较好的文章，每天抽出一两个钟头认真钻研，并在书上空白处写满了批语。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圈密点，批上“此论颇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划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也”。有同学问他，为什么对于同一个人的文章，有的地方那么赞赏，有些地方却那么鄙视呢？他说，一个人讲的话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何况古今不同时，事理多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也不应该把古人全盘否定。

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大都带有形式主义的偏见，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坏，只有西方思想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全盘西化。毛泽东反对这种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想。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对西方文化明确地持批判态度，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见的。

毛泽东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态度，在他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反映得十分清楚。这本书是德国的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著的，是一部带有二元论色彩的伦理学著作。全书的中文译本约有十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凡原著中比较合乎辩证、唯物观点的地方，必密加圈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和怀疑之处极多，其批语是：“诚不然”、“此节不甚当”、“此说终觉不圆满”等。绝大部分批语是阐述自己的伦理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其中许多地方是联系中国的历史和“五四”前夕的国事与思潮，进行分析对比，综合研究所阐发出来的深刻见解。

这本毛泽东批阅过的《伦理学原理》原件，曾一度被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杨韶华借去，直到1950年9月15日，杨才趁周世钊上京之机托周奉还于毛泽东。归

还时杨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毛泽东学习的第三个特点是采用各种形式寻师求学。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他想方设法找书看，他常到城里的书店和旧书铺去，看到合适的书，就买下来。一师图书馆藏书丰富，更是他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里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他借阅过很多。由于借书频繁，他与图书管理员熊光楚成了好朋友。

长沙小吴门附近的船山学社，也是毛泽东常去的地方。船山学社于1915年开办，是湖南一些文人学士讲演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场所。袁世凯称帝时，这里是少有的能够公开听到反袁呼声的地方，他常邀集一些同学到这里来听课。

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等六位一师教员都住在李氏芋园，毛泽东与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等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课余哲学小组，利用星期日和假期常到这里来，向杨、黎等各位老师请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并议论时局，臧否人物。

凡属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城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探知消息和住址后，总是千方百计去拜访、聆教。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白浪滔天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肖三）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给这位日本知名人士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表示“愿一望见”和求教。信写道：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靦面无缘，远道闻风，今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泽东、植蕃，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毛泽东在学习上除上述特点外，还有一点是反对旧的教育制度。辛亥革命后，我国的学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多，学生负担过重。因此，毛泽东把学校课程的设置比作“杂货摊”。为了不影响他自己的学习兴趣，他制订了自学计划，把重点放在哲学、史地、文学等社会学科的研读上。对于其他课程则不花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满分。自学计划逐年修订，限定每个阶段的主要读物必须按时完成，绝不因为学校课程繁杂、考试频繁而变更计划。

第三章 野蛮其体魄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大变动的年代。为了适应艰苦的求学生活，也为了将来能应付更加繁重的社会使命，毛泽东非常注重体育锻炼，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应当说，正是由于这一看似平常的运动爱好，使毛泽东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能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这与他从青年时期就注重体育锻炼分不开。

第一节 强身健体，倡行体育

一、游泳

游泳是毛泽东一生爱好的体育运动。在韶山冲毛泽东家门前有一个池塘叫南岸塘，童年的毛泽东就是在这个小池塘里学会了游泳。劳动之余，他常和伙伴们在这里游水嬉戏，每到夏天，这里更是他和伙伴们的天下。在这个美丽的小池塘里，他练成了最初的游泳技巧，也培养了一生的游泳爱好。

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址靠近湘江南湖巷，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常和同学到那里去游泳，每次游上两个钟头，还没有尽兴。

南湖巷也是木排停靠的地方。有一天毛泽东从木排边游到江对岸，又从江对岸游回木排，来回好几次，力气支撑部下来了，身子往下沉，幸好得到陈绍休同学的救护，才得以脱险。后来，陈绍修在赴法勤工俭学时，得了重病、毛泽东得知消息，在国内筹款寄去，但筹款尚在途中，陈绍休就病逝了、为此，毛泽东曾经痛哭（苦）一场。

在长沙城，最理想的游泳场是橘子洲头，那里河宽水深，是天然的游泳场，并且沙平水浅，最适宜初学游泳的人。毛泽东经常组织同学去那里学游泳，他任技术指导。

毛泽东是一师的游泳健将，他有许多别人赶不上的技术：一是体力好。湘江涨水时，江宽达两华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二是耐寒。寒冬腊月，大家穿着大棉衣，他可以再江水里游上半个钟头；三是游泳姿势多样。他会仰泳，侧泳，自由式，蛙泳式，踩水，坐凳子。

但毛泽东还不满足，只要听到哪里有游泳的人，就会去拜访，共同探讨游泳技术。1918年初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的李某，因事回家，路过长沙，毛泽东听说他游泳很好，就通过一位老师的介绍，邀请李某到橘子洲作游泳示范表演，传授游泳经验。

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瓚等在游泳后，常坐在橘子洲头的沙滩上，谈论他们共同关注的治学，修身，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等问题，直到夕阳西下，才踏上回去的路。

同学罗学瓚曾在一篇日记中记着：“今日往水陆洲(即橘子洲)头泅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亦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之最有益者。”

和同学、友人在湘江的游泳与畅谈，也给毛泽东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常回忆这段青春时光，留下了“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感人诗篇。他们把游泳作为每天不可缺少的功课，也把游泳作为奔向人生大战场不可缺少的准备。

毛泽东曾在自己的游泳诗和日记里写有这样的豪言壮语：“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常告诉同学们：一个人做事，总要放勇敢些；如果畏首畏尾，前怕龙后怕虎，那什么事也干不成。搞体育锻炼也一样，不要被困难所吓倒，要有霸蛮精神，要有勇敢奋斗精神。

二、冷水浴

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遇上了一位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老师杨昌济。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不完全在于课堂教学，更表现在于平时的身教。这就是我国“身教重于言教”的格言之意。杨昌济对于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就充分表现这点。

毛泽东在杨昌济先生的教导下，所受的影响很大，特别是磨砺意志方面，达到了效仿的程度。杨先生爱好远足，毛泽东效仿。1917年9月16日，张昆弟日记载：“今日星期天，约蔡和森，毛润之，彭泽后作一二小时之旅行。”结果，他们一直游到离长沙四五十里以外的“昭山”。

一天夜里，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毛泽东浑身淋漓来到蔡和森家里。蔡和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看你淋成这个样子。”毛泽东笑着对蔡和森说：“我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并借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胆量。

1917年6月，湖南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400多学生中遴选出了34人。毛泽东得票最多。其中“胆识”一项，为毛泽东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杨先生提倡冷水浴，并且自己坚持数年如一日。受杨先生影响，毛泽东后来坚持进行冷水浴，每天天刚蒙蒙亮，他总是一个人悄悄的来到第一师范水井边，先用吊桶打水淋在身上，然后用毛巾擦洗全身直到发红发热为止，一年四季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从来都不例外，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练习自己无所畏惧的精神。

毛泽东最初试行冷水浴是在炎热的夏天，秋去冬来，坚持了下来。即使在大雪纷飞，数九寒冬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洗冷水浴。起初和毛泽东同时洗冷水浴的还有好几个同学，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天气一天天变冷，最后就只剩下毛泽东一人了。由于身体强壮，毛泽东从没有因洗冷水浴着过凉，生过病。

更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受杨昌济先生身教的影响，简直达到心领神会的地步，不仅停留在一般学习的表层，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夫体育之主旨，无用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可见，毛泽东对杨昌济先生的冷水浴，远足等“磨练意志”的做法和习惯，不仅视为增强体质，而且提到“固人生事业之先驱”的“意志”高度，足见其真知灼见。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效法杨先生“冷水浴”，“远足”的基础上，开创性的组织同学从事体育运动。

三、登山 风浴 雨浴 日光浴

除冷水浴之外，毛泽东还有风浴，雨浴，日光浴，登山，露宿 等等锻炼身体的方式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登山运动就是他的一大爱好年轻的毛泽东经常在岳麓山锻炼体魄“风浴、雨浴”。

岳麓山与一师隔江相望，方圆8平方公里，最高峰297米，虽不很高，却也郁郁葱葱。课后，毛泽东常和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或在半山腰的爱晚亭中读书、谈天，或登上峰顶，看湘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他们也常在雨天、雪天，甚至风雨交加的深夜去登山，在山间奔跑，实行他们的雨浴、雪浴。

有一次，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健步登上了山巅。不久，突然冷风四起，空气清新，他们乘机作“大风浴”。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天际灿烂的彩霞，江上往来的白帆，大自然的瑰丽风光，尽收眼底。这

时，他们吟诵起山顶云麓宫前望江亭上的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体味着其中的意境，顿觉胸怀开阔，旷然有凌云之慨。

毛泽东还通过野外露宿来锻炼身体和胆量。他常邀集一些同学到学校后山的君子亭、橘子洲头和岳麓山的云麓宫、白鹤泉、爱晚亭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后，他们就畅谈国事、人生和学习心得，直到深夜再露宿到天明。夏天晚上蚊子多，为了防止蚊叮虫咬，他们就从头到脚用报纸盖着。这种露宿活动，一直坚持到深秋霜降。

由于坚持不断地进行锻炼，毛泽东的体质日益强健。使他在后来的战争岁月中受益匪浅。毛泽东不仅自己刻苦锻炼身体，还带动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他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研究部长时，就组织过游泳，有百余人参加。

四、乒乓球

毛泽东终生喜爱的运动项目还有打乒乓球。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他就爱上了乒乓球运动。当时一师有很大的操场，但没有室内运动场，一到雨天就不能开展运动，而长沙的雨确是很多的。毛泽东认为乒乓球要求场地小，器材简单，最易开展，因而倡导在学生中开展乒乓球运动。

在他任学友会总务时，曾给每班配置有简易的乒乓球台，使乒乓球运动在一师得以普遍开展。第一师范学友会记事录中曾记载此事：“惟乒乓一事轻而易举，随处设席，无须专室，运动即和徐适度，而置备复易。乃作木架12个，竹布网12片，每班各一，由每班一人具名领取。”

五、六段运动

在湖南一师，毛泽东还独创了一种“六段运动”。这种运动包括手部运动、足部运动、躯干部运动、头部运动、打击运动、调和运动。共六段二十七节。毛泽东在谈及六段运动时深有感触地说：“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此外他学过武术，他学过棍术，他学过西洋拳击，他还学过西洋剑术等等，当然，后两项，拳击和剑术这个是当时学校的外籍老师教给他的。

六、引导同学们一起锻炼

毛泽东不仅注重个人强身健体，而且还主张通过去群体性学生体育锻炼的开

展，达到个人身心共同完善而民族身心也共同完善的目的，提高青年人的体质，为将来改造社会和世界事业打好身体基础。

毛泽东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群体性和体育道德、运动动机。他对贺果等校队同学说，你们有锻炼的兴趣，是可贵的，但不要只偏重一两项，搞畸形发展，还应该懂得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搞好学习，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大任。贺果等同学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开始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锻炼和娱乐活动：踏雪，游泳，泛舟……长沙的橘子洲头，岳麓山顶，爱晚亭下，白鹤泉边，常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同学相邀露宿的地方。每当夜幕降临大地的时候，这些爱国的热血青年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抒发情感，讨论时事人生，心忧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或评书读报，交流学习心得。有一次，同学们在橘子洲划船游江，正是1917年中秋节之夜，皓月当空，清光万里，大家谈笑风生。毛泽东提议背诵唐诗中带“月”字的名句，贺果、张昆弟、罗学赞等立即响应，竞相朗诵。诗声，笑声，划桨声，飘荡在月色下清波上，他们共度了一个难忘的月夜。然后停船橘子洲南边，大家下船后就露宿在沙滩上。大地做床，青天为帐，卧听波澜水声，不知东方既白……

七、《体育之研究》

青年毛泽东不仅爱好体育锻炼，而且善于研究体育精深，总结体育心得。1917年4月1日，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这也是毛泽东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这是他总结自己体育锻炼经验、阐述德智体三者全面发展关系的文章。

在《体育之研究》的开篇，毛泽东就明确地写道：“国力衰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甚可忧虑。”意思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人民体质的好坏有密切关系，不可忽视。我国的国力衰弱，人民体质不强，其原故是提倡体育运动者不得要领，没有抓到根本。长此以往，国力、民力更会衰退，值得担忧。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德育、智育，皆载于体；无体，则无德智。体育在人生中、在德智体三者中，居于首位。

在文中毛泽东批判了旧教育制度“多偏于智而略于体”摧残学生实身体的罪恶，提出“小学教育，宜注意身体发育，而增长知识，宜以养护为主，教授、训

练为辅，因为他们处在发育时期。至于中学生，宜以德智体三育并重”。“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正确认识与掌握德智体三者的关系，也就把握了学习的规律。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锻炼身体的经验，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口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力求“身心并完”，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些充满智慧的论点，至今都是熠熠生辉。

第二节 军事奇才 胆识过人

毛泽东重视体育，不仅在于强身健康，还在于养成无所畏惧的勇气和胆识。而毛泽东的胆识在他生平的第一次军事行动——猴子石缴枪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原集结株洲、湘潭一带的三千北洋败兵溃退到长沙，因不知城内虚实，不敢贸然进城。暂在猴子石一带徘徊。眼看一场兵祸就会来临，长沙城市民惶恐不安。当时，校长孔昭绶不在校，他11月初到杭州参加全国教育联席会议去了，由学监主任方维夏代理校长职权。方维夏紧急决定，全校集合，准备撤到城东5里的阿弥岭暂避兵祸。可是学生集合以后，等了很久，却迟迟没有等来撤退命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毛泽东跑去找到了方维夏，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现在不能撤。

那么不撤怎么办？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想法：利用第一师范学生志愿军，再联系当地警察，冒充桂军，主动出击，趁敌心虚，逼降敌人。

方维夏接受了毛泽东大胆的建议，于是一场智取北洋败兵的军事行动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悄悄的进行了。

按毛泽东的安排，警察和学生军做了充分准备，准备好了灯笼、火把、煤油桶、鞭炮，当然还有真枪假枪，编成三队，每队带几枝真枪，总共才十几枝，分到每队就几枝了，其余的人带假枪和鞭炮、煤油桶这些。分三路绕道占领了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其中毛泽东带主力，由南路正面占领了金盆岭，也就是猴子石以北的制高点。三路人马，对溃兵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同时，毛泽东事先又挑了几个会讲桂林话的同学，冒充桂军嘛，到时准备对敌人喊话。

时将黄昏，溃兵一直等不到城里的动静，大概是觉得桂军应该没有进长沙，胆子大起来了，沿着粤汉铁路，开始向北移动，企图进城。等他们临近埋伏处，突然之间，火光四起，枪声大作。

哪来的枪声？北洋败兵一时懵了。

原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警察在山头鸣枪，学生军则在更远的地方鸣放煤油桶里的鞭炮，同时把灯笼、火把到处点燃。几个会桂林话的同学，使劲喊：

“傅良佐逃跑了，我们是桂军，缴枪没事”。总之，那一刹那，枪炮齐鸣，火光如海，四面呼应，杀声震天，造起了好大的声势！北洋溃军这一下，原本已经是惊弓之鸟，突然遇到这个架势，魂飞魄散。毛泽东趁机派人过去跟他们谈判，结果非常顺利，人一派过去，没多久，溃兵就举起了白衬衣，举白旗了，3000北洋溃兵，全体缴械投降。

这件事之后，孔昭绶校长在第一师范校志中，留下全校师生对毛泽东的一句评价：“毛泽东通身是胆”。

第四章 读无字之书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人的一生要读好两本书：一本是书本这本有字之书，还有一本是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他曾在自己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所以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报纸，还经常走出校门，向社会学习，向民众学习，以道寻道。

第一节 千里游学，了解社会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曾经两次以“游学”的方式，通过长途徒步旅行的方式，深入湖南农村，考察实际。

毛泽东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出游呢，这要追溯到旧《民报》上的一则故事。

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曾经回忆到：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他一些旧《民报》看。有一天他读一份旧《民报》时，恰好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真实故事，他们徒步游历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了毛泽东很大的鼓舞，他很想以他们为榜样，效仿他们游历全国的行为。

但在当时的社会，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要想漫游全国的名山大川，自然难以遂愿。所以毛泽东打算先到省城附近和家乡韶山做短期游历。此后，胸怀大志

的毛泽东就开始常常利用课余、周末和寒暑假，邀上同窗好友，走出书斋，游览古迹，凭吊古人，遍寻山野，深入农户，调查访问。

这种短期的游历让毛泽东深深的体会到，游学经历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了解社会、看清现实，短期游历的成功，也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做长期游历的信心。

1917年暑假，一个美丽的夏日，毛泽东早早地来到楚怡中学，他剃着永远不变的大兵式光头，穿了一套第一师范的校服，那是一身白裤褂，已经很旧了。至于行李，毛泽东则只带了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中包着一套可供换洗的衣裳、洗脸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同行的萧子升所带的行李跟毛泽东的差不多，另外还多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因为两人事前曾经商量过，不带更多的东西，携带的东西愈轻就愈能走的快，走得远。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个向往自由的进步青年，从长沙楚怡中学出发，正式踏上了一次终身难忘的游学之旅。

毛泽东与萧子升结伴出了长沙小西门，跨过湘江，两人便开始朝着北边的宁乡县城方向走去，踏上了通往宁乡的石板古道。

夏天骄阳似火，两人经常要在大太阳底下匆匆的赶路，没有帽子，头晒的滚烫，他们仍然坚持没有打伞；穿着草鞋，走在像火烤一般的石板路上，脚也被烫的厉害，但是两人却享受着这种自由随性的行走过程。两人便经常互相讲述各种有趣的事情来解闷，不仅解除夏暑困乏，还能交换思想、开阔思路。

这一次，他们有意不带一分钱，决定仿效旧时文人“游学”的方式，解决一路的食宿。

他们“行乞”的第一家是一名姓刘的老乡绅。是一位翰林，现已告老还乡。已经饿得要命的毛泽东对萧子升说：“刘翰林就是我们行乞的第一户吧！我们写一首诗送给他，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好啊”萧子升回答说：“我们一起写首联语诗。”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泽东)

竹杖草履谒学尊(萧子升)

途见白云如晶海(萧子升)

沾衣晨露浸饿身(毛泽东)

就这样，毛泽东和萧子升用一首诗敲开了刘翰林家的大门。刘翰林和他们谈的很开心，对于毛，萧的提问和回答都很满意，讨论结束后，刘翰林递给了毛泽东他们一个纸包，打开纸包，里面有整整40枚铜板，这下毛泽东他们就“富”有

起来了。这是他们俩在游学路上赚的第一笔钱。

于是，接下来的一路上，遇到学校、商店、庙宇等，他们便写一副对联送进去，来换取一些铜板。萧子升写得一手好字，但是爱面子，只写不送，毛泽东则头脑灵活才思敏捷，于是两人分工，萧子升负责写，毛泽东负责送。于是一路上，他们赚得了不少的盘缠。

游学路上，毛泽东和萧子升还克服了层层困难。口渴了，就在路旁溪水边捧起凉水喝；走累了，就到河里洗洗澡；走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时，就露宿野外。有次，他们夜宿于河边沙滩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月亮是灯，星星作伴。他指着岸边一颗老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说着，顺手便把布包、雨伞挂在树上。睡觉没有枕头，他们就找了两块石头，石头太高，就把一半埋在沙地里。他们以天为盖，以地为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他们一边自由的行进，一边谈论着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他们沿着商量好的路线，走过许多市镇，经过更多偏僻的农村，一路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

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谈话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总是主动的与贫苦农民拉家常，或顺道帮他们干点农活。农民们见毛泽东平易近人，说农家话、讲农家事、做农家活，都愿意和他交谈，还热情地留他们吃饭、住宿。毛泽东在与农民聊天中，发现农民们大多对现在的生活义愤填膺，纷纷诉说自己长年劳作苦累却仍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生活。农民们还告诉他们，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农民暴动，实在是官逼民反，政府的层层盘剥已经使得许多农民们走投无路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路过沙田时，还特意到杓子冲拜访同学何叔衡。何叔衡家屋后崇山峻岭，左为马里山，右为大树山，有清泉自后山而下，绕宅而流，风景宜人，成了他们休整的好驿站。何叔衡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二人，在何叔衡家他们一共住了三天。白天，何叔衡带着毛泽东见一见贫苦的农民，了解农民的养殖的家禽、家畜，生活状况；晚上，三人点起油灯探讨农村的出路、农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而这，也是他们思考农村出路的开始。何叔衡对他们的游学非常感兴趣，可是家里“双抢”正酣，自己是家里主要精壮劳力不能随他们同行，只得依依惜别。

后来毛泽东和萧子升来到了安化，查阅了安化县志，还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并且到一些贫苦农家走访，在县劝学所拜会了所长夏默庵先生。

夏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平时喜欢吟诗作对，不过性格也很高傲，当时有些穷酸秀才、文人不事农活以游学为名游手好闲，骗吃骗喝，夏老先生一向不理睬这些游学先生。毛泽东连着两次求见夏先生，两次都被拒绝了。不过他并不灰心，继续第三次登门求见。

这次，他们写了一首诗转交给夏先生，先生一看，觉得字写得真不错，飘逸灵动，于是夏先生开门，让他们进去了。

不过夏先生又出了一个难题，想试一试毛泽东学问的深浅。他看着外面的风景，挥笔写了一句对子，放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随即应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看后见下联胜过上联，工整又意境深远，借景抒怀，关心社会，远超自己写景状物，还带有火辣暗喻意味，要夏老先生汗颜。夏先生一看，是连声赞好，觉得这两个学生真不错，于是留下毛泽东他们，几个人彻夜长谈。夏老先生对中华族群谱系深有研究，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他对毛、萧讲述了中华民族先民繁衍生息的历史，使毛、萧深为惊奇，这样偏僻的地方居然藏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士，真是沧海遗珠。最后告别时，夏先生还送给毛泽东八元银洋。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一直记得夏先生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曾致函索阅。夏老先生《中华六族同胞考说》对毛泽东制定民族政策的影响值得研究。

就这样，他们边走，边拜访，边调查，走完了全程。这是一次涉及面很广泛的社会调查，从县太爷，归隐山林的方丈，到店铺的老板，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户，还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这些人的生活环境和经历都不一样，使毛泽东感受到只有农民才是历史的主人。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们走遍了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款待和欢迎。”

毛泽东，萧子升最后回到楚怡学校，放下包裹，打开一数，还有2元银元，40枚铜板。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还特意穿着旅行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这次当叫花子游学，毛泽东到过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城，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步行九百多里，写下了许多笔记，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们传阅了他的“游学”笔记后，纷纷赞誉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自此以后，毛泽东多次外出游历。他每到一处，都要拜访县劝学所的所长，了解教育情况；也参观一些名胜古迹，知悉一些风俗民情，并实地探访农民的生

活情况。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还进行有两次游学，一次为1918年与蔡和森等环洞庭湖畔的游学，另一次为1917年与陈章甫、陈绍休一行来到浏阳文家市铁炉冲游学。通过丰富的游学经历，毛泽东获取了社会这本“无字之书”的知识，真切地了解了农村的实际情况，亲眼目睹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艰难生活，养成了社会调查的习惯。从这些经历中，他也感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力量无穷，才能昂然前行。

第二节 学以致用，勇于实践

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才德出众，深得同学们的信赖。从1915年11月起，他便开始在学校学友会担任文牍。当时学友会的各种重要文告，大多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1917年，毛泽东在学友会的34名积极分子中脱颖而出，经过学监主任方维夏的推荐，开始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的部长，全面负责学友会的事务。而在这之前，这一职务一直都是由老师担任的，这也开创的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由学生担任的先河。

毛泽东担任学友会会长期间，带领同学们积极开展各种社会实践。毛泽东把参加社会实践，当着服务群众、贴近群众的，向社会大众学习的极好方式，特别是主办工人夜校，为他积累了初步的社会经验。

一、学校初办工人夜学

辛亥革命前后，在第一师范附近，集中了长沙的几家新式企业：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还有长株铁路的一段也通过这一带。而在学校附近居住的大多也是以人力车夫、产业工人、小商小贩为主，这些人不仅生活上贫困，而且大多没有文化，也没有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受苦受难命运的途径。因此，第一师范于1916年12月开办了一所工人夜学，专收校内外失学的职工，教他们文化知识。

工人夜学不知是宣传效果不好还是方式不妥，总之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所以知己导致停办。

二、毛泽东接手工人夜学

毛泽东接任学友会的工作之后，带领大家展开了关于工人夜学是否有必要继续办下去的讨论。毛泽东总结了先前工人夜学开展的不顺利的教训，并提议这次由第一师范的学生自己来承办，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

同学们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紧张的组织 and 筹备工作中去，他们先后三次发出“湖南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第一次工人夜学的广告新鲜出炉了，招生广告编印分发出来后，学生们就跑到附近的街道小巷中分发，还请到了警察协助帮忙分发。

可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在工人中产生的反响给大家浇了一盆冷水，“久之无效”，无人响应。

他们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继续印发第二次招生广告，这次他们除了分发传单之外，还印刷大号广告粘贴在小巷、工地、住宅区的明显处，希望引起工人们的注意。而且为了增加吸引力，特意在广告上写明：“本校酌情供给油印讲义并津贴灯油茶点，不取分文，惟笔墨纸张自备。”可是还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虽说较第一次有所进展，但报名者依然甚少，只征得了九个工人前来报名。大家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中，为什么两次分发广告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呢？既然不是大家不够努力，那么只能说明广告设计存在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总结前两次的教训，毛泽东觉得，要让工人愿意来学习，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来报名。另外，在这里，毛泽东特意强调了语言艺术的作用。他认为，先前夜学广告的语言通篇都是书面语，通篇都是文言文，文字晦涩难懂，不适宜工人群众阅读，工人们读起来自然而然就会敬而远之，没有亲近感。所以，要改变广告的语言叙述方式，让广告的语言灵动、活泼，充满着诙谐、幽默且深入浅出，把工人夜学开办的重要性这一深刻的道理由说理化转变为浅显化的叙述风格，达到通俗易懂的效果，才能吸引更多的工人去阅读它，使工人对夜学不至于产生疏感，才会促使更多的工人来夜学报名。

大家听了毛泽东关于广告语言运用的讲述，都觉得十分有道理，会场上又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大家都深深意识到只有以一种风趣幽默、通俗易懂的语言去劝告工人，才能博得工人的信赖与好感。于是，以毛泽东为首起草了一份新的广告语，再次动员工人报名，这次采用了白话文写作，题为《工人夜学广告》，全文如下：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说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

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这则全新的招学广告透露着风趣幽默的味道，运用一系列的排比句，读起来也朗朗上口。而且这则广告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工人朋友的关心之情，言语通俗易懂，平和质朴，无形之中增强了工人对广告的亲近之感。最重要的是，这则招学广告的语言深入浅出，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把展开工人夜学的必要性用生活化、通俗化的语言讲述出来。广告的语言在深入浅出的基础上，不乏煽动力和鼓动性的语言，一读起来，让人觉得酣畅淋漓。

果不其然，这则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广告很快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带领同学们到工人的车间、宿舍宣传、发动。这种做法，大受工人欢迎，三天内，就有102人来报名，到开学时，报名的人数达到122人。

三、夜学里的毛先生

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学正式开学。为了办好夜学，毛泽东设立了《夜学日志》。开学当天，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记载：“此次报到，既积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之三，也有在初小读过一年及二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之多，假使无此夜学补救，将永远废学矣。”“至于中年失学、要求报名者，无法统计。限于名额，劝其来年再说。”由此可见，这则新广告效果有多好。

夜学开学后，毛泽东除了负责管理工作之外，还担任历史教员。另外，他还每晚都去听其他老师讲课，不厌其烦地对教员们强调，给工人授课时要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尽可能鼓励教员把课上得有声有色，让工人的课堂充满风趣的氛围。

《夜学日志》是创办夜学之初设立的，其中及时记载了夜学的主要活动和对教学经验的总结。11月12日，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中记录：“教授两点余钟，

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11月14日，毛泽东又在《夜学日志》中记载：“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常识分量亦嫌太多，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讲演；终将，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

11月16日，在物理常识课堂上，因老师张超语言太过深奥，没有充分联系实际，“年幼者尚觉翘首倾听，年长者率多奄奄垂头”。于是，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语言给大家讲，物理这门科目，其实十分有趣，他旁征博引，以身边的现象和日常生活的经历为例，举出点灯之所以能够照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度如此之快，都是物理知识的应用体现，这些话一下子就提高了工人的兴趣。

毛泽东还常常鼓励工人，为了唤起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他在向工人讲述“工人”两个字的时候这样说到：你们看“工人”的“工”字，上面一横是天，下面一横是地，中间站立的就是顶天立地的工人阶级。你们再看“工人”两个字加在一起是什么字？是“天”字，象征着工人阶级是天底下最强大的阶级。

毛泽东总是能把深奥难懂的知识 and 道理用最易于群众接受的方式，有条不紊地道来，自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夜学的各项工作在他的管理之下也一直井井有条，工人们都说：“毛先生是我们的贴心人”。

第五章 良师熏陶，学友砥砺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五年半时间里，他得到了一大批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良师的悉心栽培，同时，还结交了一大批忧国忧民、志同道合的学友。正是在与良师益友的切磋砥砺中，青年毛泽东脱颖而出，成为第一师范众多青年才俊中的佼佼者，为今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良师熏陶

一、印象最深的教员——毛泽东与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湖南长沙板仓人，中国近代著名的伦理学家和教育家。自幼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求学于岳麓书院，后又留学日本、英国等国，主攻教育学、哲学、伦理学。学成归国后，湖南都督谭延闿欲聘请他担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当时都督

下直接设司长，教育司长相当于现在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杨昌济果断谢辞。

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回忆起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读书生活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

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担任修身与教育学教员。

任教的第一天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志向：“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这五年半的执教生涯是他一生事业的黄金时代，他的宏伟志向也得以实现。

特别是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杨昌济先生不仅授之以博大精深的书本之道，更引导他走上经天纬地的社会之道。

他担心学生的视野受课堂的局限而不能与现实接轨，于是1915年在浏阳正街李氏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教师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都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从1914年冬天到1915年秋，每逢星期日，他们齐集到杨先生家中讨论哲学问题。每次碰到一起，每个人就陆陆续续把自己一星期来的读书心得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解读精彩处，提出疑难点，杨先生家里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了。

毛泽东在杨老师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

1915年暑假，毛泽东没有回家，而是选择让杨昌济先生为其辅导哲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敏学的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他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1915年夏季学潮之后，杨昌济为抗议校方处分毛泽东的专横做法愤而要辞去一师的教职。慈师对爱徒的爱护可见一斑！

在杨先生1915年4月5日的《达化斋日记》中更能看出他对毛泽东的喜爱之情：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一位教师，能对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村学子的生长环境、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可见对其关注度极高；一位学子，能得到谨言慎行的老师“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至高评价和鼓励，可见其内涵确实不同凡响。

同时，国内局势发生变化，民主运动悄悄兴起。

1915年9月，就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青年》杂志于上海创刊（后改名为《新青年》），它冲破封建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唤醒着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

《新青年》问世，受到了开明睿智的杨昌济的热烈欢迎。他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门生，让他们接收新思想的洗礼，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那里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

杨昌济不仅自己积极投稿，以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影响学生，还热情鼓励学生积极投稿，如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便是在他的支持和推荐下，得以1917年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

与此同时，在杨昌济的建议和支持下，毛泽东也悄悄接近另一个团体——船山学社。他出席了船山学社的会议，参与学社的大量活动。慢慢地，他脑海中有集体意识，产生了集结同志、组织社团的愿望，为他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作了经验上的积累和准备。

在一师的岁月里，杨昌济先生不仅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引导师，还影响着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毛泽东爱洗冷水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殊不知，这个习惯是效仿他老师杨昌济先生的。看到老师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澡，来锻炼身体，坚定意志，毛泽东也跟着学了起来。

如今，在湖南一师仍保存着一口水井。走近这口井，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青年毛泽东在此酣畅沐浴的情景。那清冷的泉水涤荡着强盛的体格，冲走了周围腐朽的尘埃，青年血脉贲张，热血奔腾，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整个天地变得开阔了……

“救国必先重二子”

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接到

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就这样，他结束了在一师的执教生涯。

临行前，杨昌济不忘作为师长的职责，语重心长地教导学生们要珍惜光阴好好读书。在一片悠扬的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生生活。

但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生涯结束，并不是他与杨昌济先生师生情谊的终点。毕业后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想趁着年轻继续深造，可又苦于缺钱。在彷徨困窘中，他去信北京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响应。杨昌济先生希望毛泽东“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

1918年暑假，毛泽东等人匆匆北上，这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在古都北京，“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全凭杨昌济先生操持。他被杨先生留在家里，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

当时，师母向振熙还经常特意为他做几样可口的湖南家乡菜，让他饱饱口福。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老师全家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为了不给杨先生一家增添太多的负担，毛泽东要求杨先生帮助找事做。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虽为八元，但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在进入人才济济的北大工作不久，根据老师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图书助理员的有利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除了听课，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日复一日，他汲取了新的知识，结交了不少的名流学者。

为了使毛泽东更深入地接触知识界的名流，杨昌济先生还向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马克思主义介绍者李大钊推荐了他。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为日后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宝贵的出路。

充实忙碌的时光易逝。1919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毛泽东在得知老师病重的消息后，立即从外地返回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和自己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病好像一下子康复许多。在那些日子里，师生常常在医院轻声细语地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湖南局势，谈国家、湖南以及毛泽东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

当杨昌济了解到学生自前次分别回湘已有所作为的情况后，内心非常高兴。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想尽自己的全力将这块有用之才推荐给有望之士，于是，他给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了一封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

“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杨昌济先生有着惊人的慧眼，能够发掘并爱惜大才，是名副其实的“伯乐”！

1920年1月17日，病魔终于夺去了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

在杨昌济逝世以后，毛泽东与杨开慧、杨开智兄妹一起为先生守灵，以尽人子和学子之孝。痛失良师和慈父，毛泽东尤感悲恸。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只好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回归长沙板仓故里。

1949年，在杨昌济先生逝世后的第30个年头，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为领袖之后的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杨昌济老师的再造之恩。他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移到岳母加师母的杨老太太向振熙身上，全力尽恩师学生和女婿的义务。

1950年，杨老妇人80大寿，毛泽东特派大儿子毛岸英回湖南，给外祖母拜寿。并且一直关心她的生活，常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就这样一直赡养到1962年老人去世。

毛泽东和杨昌济这对堪称“父子师生”的情谊，让人无限敬仰。

二、亦师亦友先生——毛泽东与老师黎锦熙

黎锦熙，当代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汉语拼音方案》编纂者之一，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他和毛泽东1913年相识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第二年四师与一师合并，他们又一起随校转入一师。1915年受聘于当时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离开一师。虽然他和毛泽东同校为师生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在这两年中，二人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尤其是毛泽东在治学和为人方面都深受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这位老师还一直保持着往来，经常一个人跑到老师家去聊天，他说和这位老师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直至毛泽东逝世。

他们两人60余年的情谊超越生死、贫富和贵贱，成为世人美谈。

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913年，23岁的黎锦熙和20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相遇了，因为年龄相当、因为同一个故乡、更因为思想上的认同，二人一见如故。

当时黎锦熙讲授历史课，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并很快成为挚友、兄弟。

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端正，堪为人师。因此，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特别是关于如何治学等问题，黎锦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

黎锦熙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这是黎锦熙慧眼识巨才以及作为一位教师对培养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责任感。

而毛泽东也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二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

虽然毛泽东和黎锦熙在一校为师生的时间只有两年，但黎锦熙既身体力行，又诲人不倦，深深影响着毛泽东。黎锦熙生平最服膺“勤”“恒”二字，当中“恒”字最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毛泽东后来作对联一副，曰：“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足见其受黎锦熙持之以恒思想的影响。

黎锦熙赞赏“安贫乐道”精神，并身体力行。他的这一优良品行也感染了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以老师为榜样的毛泽东在生活上严格自律，从不乱花一分钱，将“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的课堂感想写在书本、铭记于心。

当时毛泽东是实实在在的一名寒窗学子，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从年头穿到年尾，天暖时单穿，天凉了就在里面加衣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黎锦熙并没有以貌取人，反而更为器重，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

在黎锦熙眼中，青年毛泽东是“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对他评价极高，可谓慧眼识英才。几十年后，回忆起在一师期间办报的事情，黎锦熙还深有感触：那

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助他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

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只是黎锦熙没有明说罢了。

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黎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黎锦熙一共写过六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

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将孜孜求学的自己比作嗷嗷待哺的婴儿，将亦师亦友的先师比作慈母，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

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了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

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老师去信，恳切地规劝：“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并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是“腐臭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恋”。言辞之中饱含对老师前途的关心与忧虑，亲密程度不亚于一位心心相印的至交。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寄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任职的机关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疏通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曾有一段时期毛泽东对一师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很不满意，认为它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这样的教育制度与他强烈的求知欲望发生矛盾时，他产生了退学念头。

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教育制度有些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黎锦熙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一师学习。

事实证明，毛泽东后来通过在一师进行系统的学习，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经受了多方面的锻炼，为他日后成就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毛泽东在他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与《民铎》同期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他还说：自己颇想研究国语，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否则“教育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在信中阐发的这种以普及国语教科书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主张，与黎锦熙多年来的孜孜以求不谋而合。这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和黎老师在学术思想上是互有切磋和交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互为影响、趋于一致的。

1916年12月9日他在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他写道：说古称智、仁、勇为三达德，现今的教育学者进而提出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表明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异，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主张。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

1949年，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毛泽东不辜负老师的厚望，终成一代风流人物。黎锦熙非常珍视和毛泽东的这段师生情谊。1953年，他将毛泽东在1915至1920年写给他的6封书信送给毛泽东，那是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珍贵通信。同时，他还将保存的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捐献给了中央档案馆，作为几十年忠诚交情的历史见证。

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段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师徒情谊不得不画上句点。得知毛泽东逝世的噩耗，黎锦熙数日不思茶饭，本已孱弱的他再次病倒，于1978年3月2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这段师生情谊长久、真挚感人，给后人留下一段佳话。

三、“教天下英才”的袁大胡子——毛泽东与国文老师袁吉六

湖南省隆回县白莲村，是一个偏远的、名不经传的小山村。村中有一座特别的墓碑，蓝天白云下，被周围的青山绿水环抱着，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古朴的土地。墓碑上铭刻着：“袁吉六先生之墓，毛泽东书”。

这位袁老师是谁呢？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其实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曾谈到过这位袁先生，他说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看来毛泽东的古文功底绝妙精深，与这位袁老先生是密不可分的。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埃，一起走进这位“教天下英才”的袁吉六先生。

中举不入仕途，只为教天下英才

袁吉六，学名仲谦，字吉六，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祖籍今湖南省隆回县白莲村。袁吉六中举后，不入仕途，矢志从教，致力于苗族、土家族、汉族人民的教育事业，造就不少人才。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请袁吉六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被他婉言谢绝。谭延闿见袁吉六是个以不入仕途为荣的人，便请他任国史馆总编修，也被他推脱。不以做官为意的袁吉六先生其高洁质朴的品质和精深广博的学识为当地人所景仰。

“倚马可待，立试万言”

1913年，袁吉六离开家乡，前往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同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袁吉六正好分配到毛泽东所在班级（预科第一班教）上国文课。

1914年，也就是毛泽东二年级时，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自此，袁老先生执教毛泽东的国文达五年之久。他和当时第一师范的老师们，呕心沥血，培养毛泽东，将其塑造成为“倚马可待，立试万言”的一代英才。

在教授毛泽东国文时，他发现毛泽东立有救国救民的鸿鹄大志，且学业成绩超出常人，便对毛泽东特别器重。毛泽东初入学期间，模仿的是梁启超的文风，操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袁吉六发现后作了认真的纠正，并要他以唐期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毛泽东遵师教导，开始转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

课余时间，袁吉六还经常邀约毛泽东在他宿舍单授读书法则，教导毛泽东读书要多写、多记、多想、多问，并向毛泽东介绍他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倾注全力帮助毛泽东集成高才。

袁吉六先生不仅关心毛泽东的学业，他还敢于碰硬，为他打抱不平。1915年上半年，毛泽东为反抗校长张干收取学杂费，张干为此大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在内的17个“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对此极为反感，便挺身而出，会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老师和张干讲明“爱竹当留当路笋，惜花不剪碍窗枝”的道理。张干只好被迫把开除学生的决议废除。

我们知道，毛泽东不仅擅长写议论文，其诗词更是一绝，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广为后人传诵。其实这与袁先生的悉心引导也是密不可分的。

毛泽东在一师时的《讲堂录》，记载了当时讲课内容，其中不少有关袁先生写作的独特见解，如：“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著之于诗”，“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做”，“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等等。袁先生这些金玉良言，对毛泽东练就“横扫千军笔一支”，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诗词创作方面，毛泽东将袁吉六先生创作理念和“文贵颠倒簸弄”的教诲，当作座右铭，贯穿后来一生的写作的之中。

一方普通的但不平凡的墓碑

1918年暑期，毛泽东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了袁吉六先生。两年后，他又回到母校，任附小主事。这时，袁吉六已于 1919

年辞却了一师的教职，回到老家新化。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解放后，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毛泽东十分向往故园，更怀念曾教育培养他成长的老师们。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特地邀请原第一师范的老师和学友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来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叙谈当中，周世钊告诉他袁吉六先生因积劳成疾，早已在1932年病逝，其遗孀戴氏年迈体弱，无依无靠，生活极苦。

毛泽东得知后，对先生去世十分悲痛，对袁师母的处境十分焦虑，立即致信当时的中共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托他们看望师母，并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1950年4月，毛泽东又派人专程从湖南新化接袁师母上北京，请人专门照顾，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对师母周到照顾直到老人去世。

1952年，袁吉六先生家乡的有关部门及其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吉六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十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上述请求。很快，毛泽东就作了回复。这封亲笔信的全文如下：

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颺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遵嘱书就，颇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都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者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顺颂旅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对师长的尊敬、对学问的重视。

后来，当地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同青山绿水一起，日夜陪伴着袁吉六先生。

三、“教天下英才”的袁大胡子——毛泽东与国文老师袁吉六

张干(1884-1967)教育家。字次仑，号攸凰。湖南新化(今新邵县坪上镇)人。1908年湖南中路优级师范学校毕业，获举人称号，留校任教。后在北京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省立长沙女子中学等校任教。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一场“驱张”的学潮

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念书时，湖南省议会公布了一项决定，要征收师范学生每人每学期学杂费10元。当时在该校任校长的张干坚决执行这项决定，但遭到了家境贫寒和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激烈反对，纷纷罢课，在校内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也写了一篇“驱张宣言”，印发全校。张干知道后，决定将毛泽东为首的17名学生统统开除。在校的进步教师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并对校方施加压力，张干只好收回成命，但还是决定给他们记大过处分。师生们仍然不肯，继续罢课，在强大压力之下，张干最后离开了师范学校，到湖南省邵阳市省立六中，以后又回到长沙妙高峰中学任教。

领袖胸怀 不计前嫌

新中国成立后，张干生活窘困，有时竟无米为炊。他曾想给当年的学生如今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写信，却又拿不起笔来。他一是悔不该当初提出开除毛泽东等人，以后又给予记大过处分；二是悔不该在1945年重庆谈判前夕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要毛泽东“应召赴渝”，“幸勿固执”，为蒋介石说话。为这些往事，他一直在惶恐与苦闷中生活。

1950年10月，毛泽东在家中宴请当年的同学、现任湖南一师校长周世钊时，询问了张干的近况。当他得知老校长一直在教书，很有触动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30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毛泽东还几分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他没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10元学杂费，不能归罪于他。”周交世钊趁机把张干六口之家的生活窘况和他的愁苦心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感慨万分，不假思索地说：“张干应该照顾，应该照顾！”

不忘师恩 关爱有加

一周后，毛泽东为照顾老校长和其他老教师的生活困难，致函湖南省人民政

府主席王首道。信中说：“张次（张干别号）、罗元绍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服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不久，王首道先后两次代表湖南省政府将1200斤救济米和50万人民币（旧币）送到张干家。

张干接到钱和米，看了毛泽东给王首道的信，感激万分。夜不能寐。在灯下，握笔含泪给毛泽东写信。“润之吾弟主席惠鉴：……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遇可言喻？”毛泽东接到张干信的第二天，就亲自写了回信，说对张干的生活困难“极为系念”。张干读完信，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将全家集合起来，又将信高声念了一遍。自己给毛泽东记一大过的事，他对儿子们从来是讳莫如深的。这次接到信后，如释重负，他畅开思想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可知道，毛主席在一师读书时，我还记过他一大过！只有毛主席这样的伟人，才不记前怨！”

1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之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游览名胜古迹。毛泽东还请来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翰溟、李漱清、邹普勋，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一起吃饭。叙谈间，毛泽东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诙谐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毛泽东的这几句话，使大家顿时消除了拘谨情绪。这时张干却想到当年那场学潮，他一边吃饭一边作检查。毛泽东听后只摆手说：“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张干在北京玩了两个多月，回到长沙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会参议、省政府参议会顾问。他常参议国家大事，深为人敬重。

第二节 益友砥砺

一、“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五四运动前，在湖南一班先进青年中，盛传“毛蔡”之名，仿效毛、蔡之行。毛、蔡者，毛泽东和蔡和森也。他们同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相同的志趣、理想使他们一见如故。他们都身量高大，都深切关心社会问题和民族命运，都擅长写文章，在一师都很出名。

时在一师任教的杨昌济先生十分器重毛、蔡二人，曾对友人推荐个他的两位

学生：“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君不言救国而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他们果不负老师的厚望。日后，两人均成为党内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物，翻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从此，两人栉风沐雨，并肩作战，由同窗之谊过渡到战友之谊，走过了风风雨雨的日子。难能可贵的是，在革命工作中，他们的观点有着惊人的巧合，可谓心心相印、肝胆相照。1936年，蔡和森在组织革命活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遇害身亡。蔡和森逝世后，毛泽东不胜悲痛，曾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从学友、会友再到战友的情谊

蔡和森于1913年秋转入湖南一师求学；毛泽东于1914年春随四师并入一师而转入。从此，两位有志爱国青年相聚到一起。他们虽然不在同一班级，却是同一年级，并且同是杨怀中、徐特立等名师的学生，所以俩人很快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学友。

1915年秋，蔡和森跳级考入了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科。高师与一师，以湘江为界，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但每逢星期天，或是蔡和森渡过江去一师，或是毛泽东渡过江来高师，两人继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7年夏，蔡和森在高师毕业后，并未急于谋求职业，而是动员母亲葛健豪把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从此，蔡家成了毛泽东等一班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每逢星期六课后，毛泽东便邀集张昆弟、罗学瓚、陈章甫等进步同学，来到蔡家开展各种讨论。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探讨，“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

1918年4月14日，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发起下于荣湾镇蔡和森家里正式建立了。从此，这两位志同道合的学友，成了新民学会心心相印的会友。

在新民学会旧址内，还藏有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1919年春，毛泽东将生病的母亲接到长沙治疗，借住到蔡和森的家，毛泽东的母亲就一直由葛健豪照顾。这张照片就是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弟弟来长沙蔡和森家，在周家台子附近照相馆留下的一张珍贵的合影，这是毛泽东母亲身前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蔡和森深厚友情的见证。

1918年夏，新民学会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出于对蔡和森的信赖，提议先派蔡和森去北京联系有关留学事宜。蔡和森抵京后，广泛接触传播新

文化的著名人士，进一步坚定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信念。

他在京写信给毛泽东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觉得，为“达到穷极目的计”，“驻京惟有润兄最宜”。

于是，又几次写信促毛泽东赴京。毛泽东的心与蔡和森的心是相印的。他接到蔡和森的来信后，立即决定去京。蔡和森得知这一消息，欣喜若狂，他给毛泽东复信说：“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弟则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这种互相信赖，更加加深了两人间的真挚友谊。这年8月，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邀集一些会友来到了北京。

他们8人同住三眼井，白天四处奔波，晚上同睡一个炕。经过他们的艰苦努力，湖南留法准备工作的进程加快了。一切基本就绪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又商定，一个“出洋”，到法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个“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19年底，蔡和森率领一批新民学会会友及湖南青年启碇赴法了，毛泽东则与另一部分会友在国内研究国情。从此，新民学会以蔡和森与毛泽东为首分成了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两部分之间，通过书信往来连成一个统一整体。

1920年8月，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建党理论和步骤，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作用和指导思想。他的这些观点为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他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而毛泽东的回信是：“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蔡和森留法归国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在党的“二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他们虽然聚少离多，但俩人患难与共，始终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1931年春，当时广东的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蔡和森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去领导南方局的工作，以挽回大局。

就在这次赴港不久，8月，蔡和森即被叛徒出卖遭捕，并被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敌人使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用刺刀把他的胸膛刺得稀烂，他不屈不挠流尽了最后一滴，牺牲时年仅36岁。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这位肝胆相照的战友。

二、“一堆感情”的何胡子——毛泽东与何叔衡

在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他是年龄最长者。1921年参加一大时已经45岁，比毛泽东长17岁，比董必武长10岁。甚至比陈独秀还大3岁。

他是谁呢？

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挚友，和毛泽东一起从一师出发，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

何叔衡是清末秀才，因为他喜欢时常穿件长衫，戴副眼镜，颇似个老学究，他的朋友、作家萧三描写他的外貌是“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何胡子。总之，他给人的感觉是个温文尔雅的老秀才，德高望重的老学究模样。

1876年，何叔衡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他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八年私塾，是清末的最后一届秀才。1902年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而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直到1909年，他才毅然决然地离开家乡开始外出求新学。

1913年，何叔衡来到长沙，虽已37岁，却执着地报考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新生，并由此结识了比自己小17岁的毛泽东。第二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他又与毛泽东一同转入第一师范读书。毛泽东在本科第八班，他被编入讲习科第一班。虽年龄悬殊，班级不同，但共同的志趣和爱好，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刚到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校内主事对这位37岁的“大龄”学生还颇为惊诧。但虽为校内年龄最大的学生，年近40岁的何叔衡喜欢抨击时弊，比年轻的学生还要激进，非常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

两年后，他毕业了，留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与毛泽东交往更是密切，相知渐深。毛泽东开展新民学会活动，常和他商量；毛泽东组织健学会时，何叔衡极力奔走联系；毛泽东发起组织驱赶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时，他也挺身而出，当请愿代表。

这对年龄相差17岁的朋友总是站在一起不断探索，共同进步。何叔衡热情厚重老成，一直是毛泽东在湖南开展社团运动、学生运动的得力助手和密友。

1917年7月，毛泽东和萧子昇暑假游学湖南，考察农村，路过沙田时，特意在何叔衡家住过三日。白天，何叔衡召集贫困农民与毛泽东进行座谈；晚上，三人点起油灯探讨农村的出路、中国的出路。他极佩服毛泽东的勤奋好学和见识超

群，曾向谢觉哉说：“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1918年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何叔衡是最早被邀参加的一人。1919年，何叔衡担任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此时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民怨极大。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湖南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张敬尧武力镇压了学生运动，导致流血事件。长沙市民曾组织过两次“驱张”运动，都未成功。12月，军警再次打伤请愿学生和工人后，新民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何叔衡主持研究具体的“驱张”事宜。在新民学会的全面领导下，湖南全省37所学校派出师生，组成6个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等地宣传“驱张”主张。

在“驱张”运动中，何叔衡领导的衡阳代表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20年，张敬尧被迫离开长沙，“驱张”运动取得胜利。毛泽东称赞他办事热忱待人诚恳，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1920年，他又和毛泽东、彭璜发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并接任了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一职。

1921年初，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运用什么主义展开讨论，何叔衡明确反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应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后，湖南军阀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了他教育馆馆长之职。

6月，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等人发来的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29日，何叔衡与毛泽东代表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在长沙同登一条轮船远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一天，谢觉哉在日记里记下了毛何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启程：

午后6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后来也告诉人们说：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后来，谢觉哉对此又回忆说：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当时，各地的代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的，以至相关的史料极度稀少。但唯独毛泽东、何叔衡的行踪有迹可寻。

1928年，何叔衡远赴苏联学习深造，第二年7月从莫斯科回国。1931年11月，何叔衡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何叔衡在长汀突围战斗中与敌人殊死搏斗，壮烈牺牲，时年59岁。真正实践了他生前所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1937年在纪念建党16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为革命的牺牲者致哀时，突然提到了何叔衡的名字。他评价何叔衡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

三、“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毛泽东与周世钊

1976年4月20日，周世钊在长沙病逝，享年八十岁。当时的毛泽东垂垂老矣，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听到老同学离开了，他心里有种难言的悲伤，学生时代的一幕幕又在脑海里浮现。他也许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也将接近终点了。同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长达63年的同窗情谊，也是与毛泽东诗交最长的“第一诗友”。1913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的周世钊，与毛泽东同学5年半，共寝5载，交谊甚笃。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致函给周世钊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可见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任与感激。

同窗共友志相通

周世钊和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是同班同学。在求学期间，俩人有着共同的兴趣、理想。他们都爱好文学，认为“文学为百学之源”。<

早在第一师范时就常赋诗写文，相互品评。1917年全校进行“人物互选”，即评选优秀学生。互选条件为德智体3个方面、15个项目，如：敦品、自治、文学、语言、才具、胆识等。12个班的学生共575人参选，当选有34人，其中毛泽东得票第一，49票，其次就是周世钊47票，并且周世钊的文学得票最高，为22票。

他俩还是全校师生所公认的品学兼优的佼佼者，也都是学友会干部，1917年毛泽东任总务兼教育部长，周世钊为文学部长。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他任国文教员。

那时正是中国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处于极端危难之际，年轻的学子们时时关注着国家大事，认真阅读每天的报纸，思考救国救民的方法。

一天，毛泽东对周世钊谈了自己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救国，必须联合广大爱国志士。后来，又与周世钊等同学商讨，决定以一师思想进步的同学为基

础，成立一个组织，取名“新民学会”。周世钊成了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先是留居在湖南大学半学斋，开展新民学会会务，筹划组织会员参加勤工俭学。之后，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经周世钊推荐两人在长沙修业小学当了教师，住房仅隔一层木板，且有木门相通。

1920年秋，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一师附小担任主事(相当于现在的校长)，这次周世钊又应毛泽东之约，在一师附小兼任高小的历史课，他们常常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切磋教学技巧。

在一师附小和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不但辛勤地教书，还志同道合地合办了《小学生》杂志，同时一起编辑出版了《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报刊，还一起创办了《湘江评论》。他们写稿、编辑、校对，有时还亲自上街卖报，忙得不可开交。

1921年秋，周世钊考入南京东南大学，1927年毕业回湘任教。

同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毛泽东准备到武昌去。临行前，特约周世钊到长沙住处望麓园长谈。老友相处多年，临别依依，杨开慧特地上街去买了很多糖果招待周世钊。

毛泽东向周世钊分析了国内革命的严峻形势，要他和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坚持革命斗争，在最艰难的时候，要能顶得住，立得稳。并说，我们这一别有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见面，望各自保重。

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和周世钊这一别，竟有23年，而周世钊和杨开慧，则是最后一次见面。以后，毛泽东、周世钊各奔前程，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毛泽东投笔从戎，“剑履俱奋，万里崎岖”，率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世钊一直留在“芙蓉国里”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也为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振兴贡献着自己的才华与力量。

周世钊无时不关心着毛泽东的动向，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给他寄过书信。1945年8月，周世钊得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为争取和平建国而奔赴虎穴龙潭的重庆时，周世钊立即寄信安慰，表达自己的问候之情。可惜这封信未能送到毛泽东手中。

诗友唱和情谊深

毛泽东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诗词唱和是文人交流的重

要途径。而现今所知，周世钊是最早与毛泽东进行诗词唱和的同学。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期，周世钊与毛泽东既是同桌又是诗友。据说光毛泽东赠送给周世钊的诗竟有50首之多，可惜后来都失传了。

现在记得起的仅有残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那时游泳活动的写照与诗词写作的记录。毛周少年同窗结诗缘时，诗词唱和就已开始。遗憾的是他们之间的具体诗词唱和之作已如烟消散了。

新中国建立前三天，周世钊以湖南一师代理校长的名义寄信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仅15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5日，毛泽东即回信给这位老同学说：“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此信中既有怀旧更有期望鼓励，特别是提出向周世钊索取“尊著旧诗”而“多多益善”的恳求，从此开始了两人中年诗词唱和频繁交往的新时代。

1955年周世钊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6月，陪毛泽东登上了矗立在岳麓最高峰的云麓宫，周世钊不觉诗情涌动，不吐不快，一首题为《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的七律诗油然而成：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后来他将这首寄毛泽东“审正”，于是有了毛泽东于1955年10月4日致信周世钊的解放后的第一次唱和：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此诗题为《七律·和周世钊同志》，雄伟壮丽的景色描绘中寄予着乐观主义精神。

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在信中附一首《水调歌头·长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风檣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殊不知，这首脍炙人口的词是答六年前答周世钊“秋风过许昌”之句。

1950年9月29日周世钊受毛泽东之邀，北上京华观礼。列车到达河南古城许昌，周世钊下车寻幽访古，凭吊一代枭雄曹操。但遗迹早已杳不可寻，只见人流络绎不绝。萧风飒飒，叶落知秋，敏感的他不觉诗情勃发，一首《五律过许昌》喷咏而出：“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残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邴中王。”抒发了历史的沧桑感。

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68岁生日这一天，又欣然给同学周世钊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函：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

同年，毛泽东写出了《七律·答友人》这首著名的诗歌：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笔力雄健，想象大胆，反映了伟大革命家豪情满怀、踌躇满志的心态。

古有伯牙子期奏高山流水以期感应，今有毛泽东和周世钊诗词互唱，互剖心迹，富有雅趣。当然，唱和的同时也加深了两人之间山高水长的友谊，给文坛留下了一段诗词佳话。

除了上述几位师友，与毛泽东结下了较深厚的师生情谊的还有张干、罗元琨、易培基、王季范、王立庵、方维夏、匡互生等先生。他们均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思想进步、忠于职守，为一师的人才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学友之谊的还有李维汉、张昆弟、郭亮、罗学赞、陈昌、萧三、萧子升等人。他们品学兼优、思想开放、胸怀天下，成为一师学子的杰出代表。

“当年师友尽英豪”。时至今日，走进湖南一师，流连于端庄古朴的校园，聆听着依旧的朗朗书声，我们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一群身穿白色军式校服的年轻人迎面而来，他们意气风发、高谈国事，争个面红耳赤，好不热闹！生在一个军阀混战、兴国图强的时代，他们一面潜心聆听师长的教诲，一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当时的一师，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毫无疑问，在一师的求学岁月是毛泽东人生的重要历程，正如周世钊日后所言：“在第一师范学校里，有最敬爱的老师，如杨昌济、徐特立诸先生；也有他最好的朋友，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诸同志。他们常常交换改造中国的意见，也常常互相期许，互相勉励：要在天昏地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要从层层网罗的包围中展开翅膀，要使自己成为当世的栋梁之材，要使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面貌根本改

变。”一百年过去了，这些年轻人的美好愿望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早已实现。留在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里的，是一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事迹定将传遍整个民族，他们的事迹终将激励后代的子孙们！

第六章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大堂门庭，悬挂着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幅楹联是校长毛泽东对学生们的勉励与希望。上联“世界是我们的”表达了主人翁思想，即鼓励大家亲近社会，将世界作为个人成长的舞台，树立远大的理想，具备宽广的视野。下联“做事要大家来”倡导为社会服务思想，如果人人社会服务，国家就会强盛起来。

1920年秋，一位高大、帅气的年轻人来到一师附小，睿智的脸庞上充满朝气，他就是一师附小新来的主事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一师附小的师生并不陌生。在一师学习五年时间里，青年才俊毛泽东大名鼎鼎。他过人的胆识、出色的才华，早已为一师附小师生所熟知。特别是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主编《湘江评论》以及驱除军阀张敬尧运动中，毛泽东表现出色，名满湘江。

作为一师毕业学生，毛泽东对附小也很有感情。早在1916年，毛泽东就曾在此实习一个月。“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做了演讲，并要大家叫他“老同学”，不要叫他“老师”。所以，重回附小任教，他也感到格外亲切。

毛泽东能来母校的附小工作，一是由于他本身就非常优秀，二是得益于恩师易培基的赏识。

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同盟会会员，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出任绅商学界总代表。1920年6月，皖系军阀湖南都督张敬尧被赶出了湖南，“驱张”运动胜利结束。随即，谭延闿就任了湖南督军兼省长。这位曾经做过一师校长的新省长一到任，即委任“驱张”代表、一师国文教员易培基为省长公署秘书长、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

易培基上任后，就在一师进行了教育改革。他首先聘请了一批业务一流并具有新思想的教职员。同时，易培基大胆启用思想进步而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教务

主任匡互生、总务主任熊瑾玎都是他破格选用的。至于附属小学主事一职，易培基则把目光落在毛泽东身上。易培基曾经当过毛泽东的国文教员，十分欣赏他的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显露出来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给他印象更为深刻，以致称毛泽东为“平民天子”。

1920年7月上旬，毛泽东带着领导“驱张”运动胜利的喜悦和满腹改革社会的热望，从北京经上海回到长沙。不久，毛泽东就接到易培基校长的聘书，受聘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年轻的毛泽东又回到了母校，回到了这块传播新思想、锻造人才的阵地。

出任一师附小主事，毛泽东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毛泽东在一师受过五年半正规师范教育，在求学期间还成功主持过工人夜学，有办学的经验。毕业后，毛泽东在修业小学当过历史教员，了解学校教育。此外，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驱张运动的历练，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而且当教员也是他的志趣所在。

1913年，毛泽东就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考入师范学校，立志做教师。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

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瓚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诸友人不要都向外发展：“深以同人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1921年，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时，毛泽东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一栏填写“教育事业”，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一栏填写了“教育学”。

毛泽东一生似乎一直对教师这个职业抱有浓厚兴趣。从事革命活动后，毛泽东也不断讲课。

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人创办了以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的湖南自修大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毛泽东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地理”等课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农运干部。

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为抗大学生讲课。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我历来最乐于做的事情就是当教员。”当教师，既是毛泽东的情趣反在，更是他的长项、优势所在。

作为一个湖南人，青年毛泽东自然特别关注湖南的教育及其改革。毛泽东曾在文章中写道：湖南“被外界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的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有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

有了这个契机，毛泽东一上任就潜心于一师附小的教育改革，附小也悄悄发生着种种变化。

一师附小创建于1913年9月，主要作为一师师范部学生的基地，满足教学科研需要，特别是学生教育实习、见习、观摩的需要。附小分为初级部和高级部，教职员主要是选用一师培养的优秀毕业，陈昌、萧三、李维汉、何叔衡等都曾先后在附小任教。附小校长由师范部校长聘请主事一人，代替校长主持附小的日常工作。当时，学校规模为7个班，共300人左右。

附小实行的是秋季招生，毛泽东去附小上任时，正值附小招生，于是毛泽东就从附小的招生制度开始进行改革。

首先改革招生范围，取消了原来招生范围只限于湘中各县的限制，面向全省广收学生，使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一师附小学习。

其次，改革了招生的录取方式，以前录取新生基本由主事说了算。因此，录取中凭关系现象比较普遍。毛泽东改变了这种不公平的招生方式，规定凡要求入学的学生一律要参加入学考试，然后根据学生的试卷，汇集分数，由校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公开录取。

第三，改革了招生时间，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常有学生错过了报名时间，以致发榜后还有学生远道而来报考的情况。如果遇到这些情况，毛泽东会根据实际情况，召集校务会议集体决定是否录取。学生只要达到条件，附小一般都会录取。

第三，放宽了学生的入校年龄。那时新式学堂开办不久，读小学的也并不一定是儿童。毛泽东自己当年进东山小学时就已17岁了，因为年龄大还差点被拒之门外。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同时也是为了给工农子弟更多的入学机会，毛泽东召集校务会议做出了放宽入学年龄的决定，从而使得一批渴求知识的大龄学生得以进入学校学习。

此外，毛泽东把收费期限也放宽了。之前，学生入学时必须一次性交清学费、杂费和膳食费，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因为一时难以筹齐学费，部分学生不得不辍

学，失去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毛泽东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上学，通过集体研究，决定允许学生分次交齐各种费用，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免收各种费用。

要办好一个学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员队伍是关键。因此，毛泽东极力赞同易培基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的主张，并在附小进行了教职员的调整工作。

毛泽东选聘教职员以德为首要标准，聘用的教师既要思想进步、品德高尚，又要具备一定的教学水平。同时毛泽东也很看重学生的意见。毛泽东经常深入学生中去，听取学生对教职员的反映。学生普遍反映不好的教职员，毛泽东就予以辞退。由是，附小有了一批像陈章甫、谢觉哉、周世钊这样德才兼备的教职员等来校任教或兼课。这支优秀教学队伍的建立，使毛泽东的教育改革如虎添翼，一师附小的教育教学生机勃勃。

毛泽东也很关心失学青少年。当时，社会上有许多贫苦青年要求到附小插班学习。为了满足失学青少年们的要求。1921年春，毛泽东在附小高小部开办“成年失学补习班”，解决了这些失学青少年的实际问题。

江苏吴县失学青年许志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许志行高小没毕业就到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当学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头。毛泽东为“驱张运动”而赴京时遇到了这个穷苦但有上进心的青年，给他路费回家暂作安顿。为了让许志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让他来补习班上课，并为他负担费用。当时，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家务农，毛泽东也让他进了补习班，成了许志行的同班同学。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成为了许志行的知心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担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1930年，许志行写了一本书，纪念毛泽东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毛泽东同志逝世后，许志行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忆了毛泽东当年在附小创办“成年失学补习班”的情况。

毛泽东对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全面发展思想。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载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而对于小学教育，毛泽东认为“小学阶段体育在德、智、体三育中占首要位置，宜专注于身体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即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为辅。”

针对当时学校课程太多太繁琐，毛泽东主张应该大幅削减教学内容，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对初小学生，要偏重于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对高小

部学生，则注重加强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为此，附小高年级的算术、社会、自然分科设立一个专门的作业室，规定每日上午100分钟为自由作业时间，各科教员分别进行指导，国语科还根据学生程度分组，分别予以指导。

毛泽东还改革了国语教材。比如，高小部三年级的国语课就用收集的时文作为教材，而不采用当时流行的课本。这样，学生就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读到像李大钊的《今》这样富有哲理的文章。毛泽东还把鲁迅的《故乡》《我们怎样做父亲》介绍给学生阅读和抄录。毛泽东自己的作品《“湘人治湘”与“湘省自治”》等也曾作为国语教材，印发给学生。

毛泽东喜欢读报，在辛亥年短暂的从军生活中就曾用大部分饷银订阅了省内外几种报纸，以此了解社会。毛泽东也向大家推荐了这个好习惯，要求学生阅读《湖南通俗报》，而且人手一份。每天上课前，老师指导学生阅读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述文章。这份由他的朋友何叔衡主办的报纸，涵盖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内容，文字浅显生动，极富教益。

毛泽东对旧式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深表不满，非常注重贯彻教育与实际相结合。1917年在湖南一师附小任实习教员时，毛泽东就重视教育与生活相联系。在他唯一流传至今的国文教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大量采用学生身边的石科、雨伞、路程、各种毛织物等生活实际来辅助教学。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附小成了一所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学校。当时，学校养猪二十多头，还开辟菜园自己种菜。学生以班为单位，每周轮流劳动一个下午（四小时），年龄小的学生打扫卫生。毛泽东身体力行，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劳动。就这样，全校师生逐渐养成了热爱劳动的良好风气。

毛泽东非常重视所传授知识的实用性。在一师附小，开设了一些实用性强、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手工程序，如竹工、木工、印刷室等。为此，学校请了专人雕刻印版，由图画、手工任课老师徐磊英指导学生印刷作文本、算术本、练习纸以及信纸、信封等。每天到了课余时间，印刷室里不仅学生在印刷，教职员也都喜欢去印刷，全校形成了爱好劳动的好风气。

毛泽东常常利用朝会，对学生宣讲国家大事及读书做人的道理，宣传新道德、新理想，反对封建制度。他常常教育学生，要尊重劳动人民，要看得起工人农民，要参加生产劳动，不要当少爷小姐。当时，小学生一般年龄较大，由于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在学校只顾读书，不管周围事物。毛泽东就在朝会上教导他

们说，人活在社会上，是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大家不要光顾埋头读书，要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多看报纸，留心时事。

毛泽东非常爱护学生，尤其对于穷苦学生，他特别关心。许志行被毛泽东收留在附小就读，但他缴不起学费，毛泽东就帮他缴。许志行没有被帐，毛泽东就让他同自己的弟弟毛泽民睡在一起。

毛泽东继承了一师民主、平等的教育、治校理念，反对动不动就开除学生。他说，学校是冶铁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没有冶炼不好的。毛泽东当年就因为发动驱除校长张干的学潮，差点被学校开除，是杨昌济、王季范、袁吉六等老师力保才有机会继续求学的。有鉴于此，毛泽东治下的附小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要开除学生得取得广大学生的同意。毛泽东反对轻易开除学生，不仅表现了他对学生的爱护，而且是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因为在旧学校，被开除的学生多数是穷苦人家的子弟。

毛泽东对学生的生活也关怀备至。他经常检查学生寝室，有时一夜检查两三次，还为蹬掉被子的学生把被子盖上。有段时间，接连几天，都有学生反映学校伙食不好。毛泽东一一仔细询问，广泛征求意见。毛泽东决定将教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分开办，并派学生代表协助和监督办好伙食，在有限的财力下，尽量使学生吃得饱，吃得好。

毛泽东不仅关心和爱护学生，对教职工同事也处处放在心上。毛泽东刚到一师附小上任时，由于军阀混战之际校舍曾几度驻扎过军队，房屋、用具遭到破坏，有多间房屋亟待修缮，教职工住房非常紧张。毛泽东把主事的那间房子让出来，给教职员住，自己却在校内打起了游击，今天睡办公桌，明天睡乒乓球案子。直到房子修好了，教职工都安排好了，他才搬回自己那间办公兼宿舍的主事室。当时，附小的教职工都反映说，主事厚待同事，薄待自己。

毛泽东不仅善待老师和学生，而且给一些为社会所不容的学生以读书的机会。1920年秋，沅江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因为钟化鹏为反抗学校教育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被学校被开除。正当钟化鹏一家发愁他到哪里继续上学的时候，家中来了人说起长沙有个湖南一师附小如何如何好。他还说，学校来了一位新主事，开始实行一套新办法，那里的许多教师追求新思想，要求到那就学的学生多着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钟化鹏喜上眉梢，赶紧打点行囊去湖南一师附小。

来到一师附小，钟化鹏在主事办公室里见到了毛泽东。看到毛泽东和蔼可

亲，没一点架子，顿时心中升起了丝丝敬意。通过交谈，毛泽东也喜欢这个倔强的学生，把他插入14班学习。

临近毕业考试了，钟化鹏焦急地找到毛泽东，告诉他原学校至今不给自己调档以前的学年成绩，到时难以办理升学手续！于是，毛泽东以一师附小名义给沅江第一高小去了函，调来了钟化鹏的学年成绩。不久，钟化鹏升入一师师范部。一师附小接收钟化鹏这样一个反对旧教育的陋习而开除的学生，正是毛泽东和一师附小的不寻常之处。

毛泽东不但努力办好一师附小，而且十分关心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1920年下半年，在附小主事毛泽东的倡议和领导下，一师改工人识字班为工人夜校，由校友会 and 附小主办，教室设在附小内。工人夜校招收一师工友、附近工厂工人及附近年长失学的市民子弟入学。教学内容不限于识字教学，还进行政治教育。为了解决经费问题，毛泽东与一师校长易培基商量后，决定在一师的经费内每学期拨发500元作为工人夜校义务教育费用。

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毛泽东坚持主持工人夜校的教学业务，并亲自给学员上课，还利用课前课后与学员个别谈话，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为了办好工人夜校，毛泽东委托王季开老师和一位傅姓老师具体管理教学工作，并邀请师范部优秀学生任教。夜校学员不断增加，由二十多人增加到四五十人。工人夜校为帮助一师工友、附近工厂工人及附近年长失学市民子弟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期间，毛泽东还经常邀请社会贤达、有学问的人来校演讲。当年《大公报》就刊登有一则新闻稿《演讲中的两件事》，记载有谢觉哉、周世钊给一师附小学生演讲的情况。通过这些演讲，新思想、新文化得以进一步传播，学生知识面得以进一步拓宽。

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工作两年间，虽然以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忙于各种革命活动，但在他的管理下，一师附小有了很大的起色和发展，并对以后的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教育教学改革外，毛泽东主事一师附小期间的一项重要成绩就是把一师附小一批教师、学生引上革命道路。何叔衡、陈章甫、谢觉哉等老师，任弼时、毛泽民、毛泽覃、易礼义、陈安仁等学生，后来都成为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担任一师附小主事后，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有力促进了一师附小的发展，也使一直关心和支持他的易培基校长，对他新颖的思想、卓越的

才能钦佩不已。于是，1921年下期，易培基校长破格聘请毛泽东兼任师范部二十二班国文教员。

当时，一师被誉为“湖南亚高学府”、“湖南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能够来一师师范部任教的老师，绝大多数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或者国内著名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社会知名学者，如李达、田汉、周谷城、辛树帜、舒新城、汪馥泉、赵景琛、夏丏尊等。像毛泽东这样的在本校毕业不久，就被聘为一师教员的还是第一例。

尽管毛泽东没有显赫的学历，还操着浓重湘潭口音，但国文功底非常深厚，口才也很出众，于是很快就成为学生喜爱的老师，他的讲课总是吸引了很多的学生。同学们发现，毛泽东讲课别具一格，不是一字一句地照本宣科，因此，毛泽东讲课或在课外讲话演说，思想新颖，理论正确，语言流利，感染力强，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系统地介绍作者的历史、思想体系和写作的社会背景，然后让同学们自习、提问题，他来一一解答。

当时，一师的学术空气很活跃、很自由，国文课文由任课老师选编，教学内容可以不一致，教师们可以各施所长，课堂材料纷呈。毛泽东本人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选编教材则注意采用时文，鼓励学生分析实际问题，形成对时代形势的见解。

此时的校园，弥漫着各种思潮，这里既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以及柏格森、尼采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有普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许许多多的主义。而已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尽量利用国文讲台，传播革命思想，以引导学生树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毛泽东选编的讲义都带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比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学学生的自述》、鲁迅的小说以及《新青年》上的文章，甚至还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学生学习的材料。也正是毛泽东的引领，使一师一大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历来就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认为“学问学问，勤学好问”，经常鼓励学生多学多问。在鼓励学生读和说的同时，毛泽东还鼓励大家经常练笔，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通过“写”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增强“说”的条理，检验“读”的效果。通过读时文，写时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增强了学习的信心，也懂得了学习的责任。

第七章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1920年前后，对于27岁的毛泽东而言是一个悲喜交加、忙碌而充实的年份。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因病去世。1920年1月17日，毛泽东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1月30日，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因患伤寒去世。短短的几个月，毛泽东痛失三位至亲和至敬的人。

失去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当。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毛泽东应当时湖南省教育会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的聘请，来到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担任主事。1920年冬，毛泽东在附属小学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兼卧室，迎娶了他仿若人间知己般的亲密爱人——杨开慧。

第一节 相识长沙，情定北京

杨开慧，毛泽东恩师杨昌济先生的女儿。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清泰乡下板仓屋场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恰巧这一天，杨家附近的飘峰山上出现了一道红霞，因而父母亲给她取了个乳名“霞姑”。

在板仓，杨开慧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杨开慧的父母出生于诗书世家，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在杨开慧4岁时就对她进行启蒙教育。在父亲这位最好的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1913年至1919年，杨开慧在家阅读了大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艺方面的书籍。

辛亥革命前夕，杨开慧跟随母亲进入离家20多里的衡粹女校求学，母女同校在当时震动了百年禁锢的山乡。随后她又进入县立第一女子高小等处求学。1913年，12岁的杨开慧随父亲杨昌济迁居长沙，住在离第一师范不远天鹅塘。

也就在这一年，20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成为了杨昌济先生的学生。随后，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与300多名第四师范学校转入到第一师范求学时，所幸的是杨先生也一同转入第一师范任教。杨先生渊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新锐的思想让毛泽东极为敬佩。而杨先生也十分器重毛泽东，是引导青年毛泽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重要领路人，对青年毛泽东的学习和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昌济桃李满天下，但他一生最欣赏的当数毛泽东。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在杨家，毛泽东是常客。遇到不懂的问题，毛泽东总是登门求教。杨先生

在指导学生作文方面，毛泽东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重视使学生通过作文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毛泽东重视选题与现实斗争的关系，他给学生布置的作文题目，大多是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的内容。原二十二班学生张恒源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给他们的布置的第一个作文题是“内忧如此、外患变如此，如何使散沙般的民众团结起来”。当得知湖南反动军阀赵恒惕把两个反对专制的青年杀害、还残忍地把人头悬挂在城门口示众后，毛泽东就鼓励学生以此为题材写文章，表达见解。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了解当时社会的黑暗，激发他们改造社会的雄心。

每逢毛泽东从容地踏进教室，开始他那生动亲切、旁征博引、谈笑风生的讲课，学生们就会像被磁石紧紧地吸引住了。外班的学生开始放弃本班的课程来听他讲课。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座位上坐两个还坐不下。学生索性站着听，室内站满了，室外走廊、窗口也站满了。这样令人羡慕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一师国文教员毛泽东的课堂上。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毛泽东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作了坚决的斗争。二十二班学生肖述凡要求进步，思想开朗，毛泽东便经常写条子约他去谈话，对他进行革命教育。当时的一师，极力提倡新文化，并从北京、上海等地聘了一些年轻的进步的教师。但教师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他们大力向学生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并组织了很多挂着研究文艺招牌、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目的的小团体。毛泽东认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就首先要与这些小团体作坚决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一师学生成立了以萧述凡等为骨干的崇新学社，开展了一系列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一师占据着优势。不久，萧述凡被毛泽东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毛泽东早期的教育实践，是与他整个早期革命洗动紧密相连的，是他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十分重视对旧教育的改革，努力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唤起工农觉悟、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更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明确地坚持工农是社会的中坚，要让工农及其子弟享受教育权的主张，坚持教育要为阶级斗争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结合的主张，坚持“三育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主张。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宝贵精神财富。

和毛泽东之间无拘无束纵谈天下大事，谈论治学之道，气氛十分热烈。每每这时，杨开慧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想着，很少插话。毛泽东颇有见地的宏论，壮怀激烈的情感和崇高远大的抱负，深深地震撼和影响年幼的杨开慧。

随着讨论和交流的频繁，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思想、情趣、爱好方面也愈发志同道合。1917年，毛泽东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他在文中写道：“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提出了一个响亮而鲜明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同时，他在日记里写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以他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心中这份强烈的信念。寒冬时节，他用冷水沐浴；大雨滂沱，他在野外奔跑；江河湖泊，他去搏击风浪。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杨开慧也坚持冷水浴、深呼吸、常吃硬食等锻炼方法。她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美好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一晃眼，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度过了五年半的学习时光，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而与此同时，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

1918年年8月15日，一辆北去的列车从长沙出发驶向北京。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长途远行，从登上火车的那一刻，毛泽东的心就和火车一起跃动起来。

自从6月，毛泽东以及一批新民学会会员从第一师范毕业后，就一直在思考毕业后到何处去？是工作、学习还是出国继续深造？正当这群热血青年急切寻求出路的时候，他们的恩师、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先生给大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的华法教育会在北京、保定等处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正在招生。这一消息激发了毛泽东等年轻人的希望，和所有的进步青年一样，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渴望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次，毛泽东带领新民学会24名会员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北上，此行的意义和责任的重大让毛泽东心潮澎湃。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到达北京，和蔡和森、罗学瓚等人住在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过着“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清苦生活。

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的青年已达50多人。毛泽东起草了一份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交有关方面协调，为筹措路费四处奔波。在毛泽东等人的周密安排下，第一期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悉数分赴各预备班学习了。事情有了着落，毛泽东舒了一口气。为了主持以后几批湖南青年赴法事宜，毛泽东决定暂时

留在北京，但盘缠所剩无几，维持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所幸在杨昌济先生的引荐下，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担任管理员，他的工作是登记所订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每天来阅报的人的姓名，月薪8元。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去杨家看望老师，与杨先生探讨人生和社会的问题。此时，17岁的杨开慧已然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大家的眼中，这是一个有着白皙的皮肤，圆润的脸庞，温和的双眸的湘妹子，温文尔雅的举止，落落大方的言谈让她与那些名媛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新俄罗斯研究》以及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等革命书刊，接触了许多革命青年，了解了更多的社会实际。就在这样的砥砺切磋中，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近。然而，对于那时的年轻人而言，爱情总是保有一份羞涩与矜持。杨开慧虽然深爱毛泽东，“但绝不表示”，因为她“不要人家被动地爱”。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

最心爱的女儿与自己最器重的学生相爱了，这引起了杨昌济先生的深思。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殊为难得”的“海内人才”，站在老师的角度，其才华、报复、气度杨先生无疑是极为欣赏的。可站在一个父亲的角度，他何尝不知道，女儿如果跟这样一个有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志向的年轻人在一起意味着什么？注定颠沛流离，甚至是流血牺牲啊。他怎么忍心让女儿有着这样的人生呢？可从青年毛泽东的身上，杨昌济先生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激情的模样。当年为探求救国真理，他孤身一人远渡重洋，刻苦求学。回国后，他不入仕途，穷尽毕生心血“欲栽大木柱长天”。而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不正是他精心培育的栋梁之才，国之希望吗？最终，杨昌济先生默许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感情。美好的感情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祝福，这让两个年轻人欣喜若狂。从此，美丽宁静的未名湖畔，银装素裹的北海公园都留下了他们甜蜜的身影。

第二节 爱在一师，琴瑟和鸣

相爱有多幸福，离愁就有多煎熬。

1919年4月，赴法勤工俭学工作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湖南，在长沙修业小学任教。而杨开慧依旧跟随父母居住在北京，两个年轻人只能借助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

回信，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积极投身于这一滚滚的爱国洪流。他在长沙创办了著名刊物《湘江评论》，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大声疾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号召广大民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北京的杨开慧每次收到毛泽东寄来的《湘江评论》，都会激动不已，她完全被毛泽东“指点江山”的革命气概，那激扬文字的反潮流精神振奋了，鼓舞了。她也学着像毛泽东那样写作，摒弃封建的旧文体，坚持用白话文，抨击弊政，同封建势力决裂。毛泽东和杨开慧共同的心声汇聚成了时代浪潮的一声声呐喊。杨开慧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我的心，他也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当这份爱情看似一切水到渠成的时候，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在毛泽东等人的妥善安排下，杨开慧全家扶柩南下，将杨先生归葬长沙板仓。

不久，杨开慧便从板仓来到长沙福湘女中就读。这时的杨开慧在毛泽东的指导和支持下，已经不再是文弱的女子，而是一个有理想、有胆识的进步女性了。她参加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全省“驱张”的斗争，积极发动同学上街游行。当学校当局阻挠学生上街，锁上大门，殴打学生时，她怒不可遏，与进步青年们冲上前去，高喊“不许打人！滚出去！”并组织同学们走出校门，涌上街头，奋起反抗黑暗势力。

有一次，杨开慧在周南女校听闻了一名做童养媳的女学生袁舜英因不堪丈夫的虐待，投塘自尽的消息，她非常的震惊，如何对付这一事件？如何维护女性的权益？她带着大家去请教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她带领大家马上行动，到大街上宣传，在校刊上揭露真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这一件事很快传遍了长沙全城，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公愤。

当时的长沙与全国各地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形势一触即发。新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来领导、来组织、来发动。1920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为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给党的创建作好思想理论准备，决定在长

沙创办文化书社，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刊物。

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进行这一工作。办书社经费不够，她就与母亲商量，义无反顾地将父亲去世时北大同事送的用来维持生活的祭奠费拿出来资助毛泽东。这期间，杨开慧还常随毛泽东去工厂、街道、农村、学校，把马列主义通俗读物和进步书刊送到工农群众手里，使文化书社不断发展扩大，影响日深。

杨开慧的思想也在这些活动中不断得到升华。1920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成立后，她就成为第一批女青年团员之一。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也在这革命的洪流中越发坚贞。共同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让两人话越说越近，心越贴越紧。毛泽东送给杨开慧的不是鲜花和蜜语，而是用心血凝结而成的诗词歌赋。

192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挥笔写下《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杨开慧同样是用最浓烈的深情阅读、感悟毛泽东的文字和情感，学习他的思想方法，领会字里行间跳跃的人生火花。她在日记中曾写道：“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头，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一切水到渠成。

1920年冬，杨开慧在哥哥杨开智的陪同下，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第一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与早已等候在此的毛泽东结为夫妻。没有嫁妆，没有花轿，不做俗人之举，仅仅花费了6块银元操办了一桌饭菜，招待了何叔衡、陈昌、方维夏、谢觉哉、王季范等几位挚友，见证了这一份琴瑟和鸣的纯美爱情。

1921年，中国革命终于迎来了黎明前的第一缕曙光，中国共产党就要成立了。这年夏天，毛泽东赶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湘区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从此，杨开慧一直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用自己的全部身心支持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两人相濡以沫，一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艰苦的日子。

1921年秋，杨开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第四篇 特色活动



这里是湖湘文化的演练场。千百年弦歌教化，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学子铁骨铮铮地向世人昭示着“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文化精髓。

这里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摇篮。113年的教育征程，春风化雨般承载着“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的教育责任和担当。

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96年前，毛泽东、何叔衡从这里出发奔赴中共“一大”，引领一批又一批的一师人前赴后继，践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誓言。

千百年风起云涌，第一师范始终不渝地高擎崇德育人的大旗，将指引伟人前行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第一章 志愿服务

1925年，青年毛泽东伫立在橘子洲头，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 长沙》一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这是青年毛泽东的真实写照，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奋发向上的斗志与激情。

今天，在“中国梦”的语境下，爱国主义教育传递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更是引导社会大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一项伟大工程。在现代市场风雨浸淫下，与其对青少年进行填鸭式地说教，不如搭建平台，通过组建青年志愿者队伍，让他们真正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人。

湖南第一师范作为一所师范类的本科院校，每年拥有一万九千多优质生源，

1922年冬，因为中国革命的需要，毛泽东辞去了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毛泽东和杨开慧也因此离开了第一师范，携手傲立于革命的潮头，共赴“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征程。

仅仅8年之后，杨开慧不幸牺牲，年仅29岁。毛泽东惊悉这一噩耗后，满怀悲痛的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壮丽爱情，正如1924年毛泽东在《贺新郎·别友》一词中所写的那样：“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间知己”正是两人的真实写照，这一段血色年代的浪漫传奇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亘古绵长、熠熠生辉。

且都是极其渴望投身社会实践的青年群体。我们依托这一丰富资源，因势利导，每年从中严格挑选200名品学兼优、形象端正、普通话标准的优秀学生组成基地爱教志愿者。组织专业老师对他们进行系统的业务、礼仪等培训，并且为他们编排舞蹈、朗诵等节目，全方位地将其打造为时间上机动、业务上专业的爱教志愿者队伍。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核后的志愿者就可以在基地为社会大众担任讲解、引导、交流、互动、表演等多种工作。一时间，游客们发现，原本严肃、刻板的红色主题参观，因为这群青春、热情的学生讲解员的诠释而显得生动、轻松。同时，他们纯净、向上的学生气息，也让游客真实的领略了毛泽东同志笔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一师校园文化。

目前这支朝气蓬勃的志愿者队伍已经成为了基地爱教工作的得力助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据统计，湖南第一师范志愿者讲解队自建立以来，先后累计讲解近20万批次，并且在2003年学校建校100周年校庆、2013年学校建校110周年校庆以及学校升本、评估等各类大型活动中担任主力讲解工作。尉健行、李岚清等中央领导来校视察时，也是由学生讲解员讲解接待的。他们的表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这一经验也被纪念馆同行业广为效仿和借鉴。中国旅游报、湖南教育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都对其进行过专题报道。

而学生讲解队队员们通过对青年毛泽东等历史资料的学习和研究，深刻的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由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地成长为一代伟人的。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由了解而产生敬佩，由此反思和警醒自己，不断激励和促进自我的学习和发展。同时，在讲解实践过程中，学生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也变得越来越自信、大方。而他们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周围的同学。加入讲解队的学生越来越多，讲解队在学生当中成为最热门的社团组织。

为提高基地爱教志愿者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我们组织专业师资，对学生志愿讲解员们在讲解词的学习、讲解仪态仪表、普通话、政治素养等方面进行严格而科学的培训和考核。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总结，我们针对爱教志愿服务的工作内容和要求，精选了五门课程对爱教志愿者进行培训，分别是：《一代伟人从这里起步——讲解词解读》、《讲解技巧》、《讲解语言训练》、《讲解礼仪》、《讲解示范》。培训课程结束后，分书面和实地讲解两方面对报名学生进行三轮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实习阶段。之后还需要就整体讲解词的熟背过关到规范讲解仪态仪表，跟随指定指导老师一对一的进行培训和考核，最后合格者才能成为爱教志愿讲解队的正式队员。正是这样严苛的培训和考核过程，激发了学生的潜

质，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一种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同时，本基地还系统的汇编了《学生志愿讲解队章程》、《学生志愿讲解队管理细则》、《学生志愿讲解队培训、考核细则及题库》等，凡事做到有章可循，按章办事，组织规范，制度严明，从机制上保证了志愿者队伍长效有序的发展。

为了丰富爱教活动的形式和感染力，我们根据学生志愿者身为师范生能歌善舞的优势，组织他们编排了《少年中国说》、《沁园春·长沙》、《五月的鲜花》等富有特色的文艺节目。学生志愿者的讲解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也成为基地爱教工作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20多年来，学校累计共有近千名学生志愿者参加基地爱教志愿讲解队伍。这些学生志愿者在向广大游客提供志愿服务，向社会传递“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的同时，也使他们成为德育教育的受益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并通过他们的辐射功能、示范功能，使基地的爱教活动更加生动、多样，也开创了基地爱教活动的新形式。

我们还充分充分利用基地资源和师资优势，引导本校大学生学习、研究、弘扬毛泽东思想，深入推进青年团员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进四信”等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的优势及作用，指导成立了一系列学生社团，影响了大批进步学生。其中“学习毛泽东协会”还荣获2016年“全国百佳大学生理论学习社团”称号。

学习毛泽东协会简称“一师学东会”，成立于2010年4月14日，前身为创建于1960年的湖南第一师范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该会以“学习青年毛泽东，改造自我与世界”为宗旨，以“知耻公诚，勤俭雄朴”为会训，以“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为理念，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为修学途径，致力于学习、研究、弘扬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协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会员从30人迅速扩大到千余人，在全校学生乃至湖南省高校学生社团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学会聘请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教授为指导老师，定期开展各类学习交流研讨活动，举行“学东大讲坛”、“润之杯”理论竞赛等特色活动，还创办了会刊《子任》和会报《学东报》。经过七年多的努力探索，学会已经逐渐成为基地最具有特质文化的品牌社团。

习近平同志指出，对于青年一代，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因此，我们只有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开展爱教工作，才能真正地引导年轻学

子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强大能量。

第二章 红色讲坛

文化是传承的产物，就如同基因是选择的结晶。纵观第一师范千百年的发展史，虽历经岁月洗礼，“崇德育人”始终是第一师范一以贯之的教化宗旨。千年前，理学大师张栻在此设坛讲学，开启了弦歌不辍的教化征程。百年间，杨昌济、徐特立等一大批教育大师在此铁肩担道义，三尺讲台育英才。

与时俱进，一脉相承。今天的我们秉承“设坛讲学”这一涵养千年的文化基因，充分利用作为高校博物馆的师资优势，设立针对不同人群的讲堂、讲座、讲台，凸显了爱教基地价值引领和思想引导的作用。

第一节 湖湘大学堂

千年前，理学大儒张栻与朱熹在湘江之上摆渡往返于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论道两月有余，骤开民智，文气沛然，开启了中国学术交流的新纪元，书写了“朱张会讲”的千古佳话。

省委宣传部、湖南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续前人雅兴，联合主办了“湖湘大学堂”这一湖南省重要的公共文化品牌，汇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设坛讲学，一道纵论湖湘文化，品评天下人物，传播人文精神。

我们作为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积极地参与到这一文化品牌的活动之中。基地馆长艾建玲教授曾荣获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先进个人称号，是全国知名的社科专家，受邀在“湖湘大学堂”中进行《青年毛泽东成才之路及启示》讲座。通过讲述青年毛泽东博闻强识、励志苦读，文明精神、野蛮体魄，尊师结友、勇于实践，确立信仰、建党革命的成长经历，揭示其成才的脉络及关键，引导广大年轻人健康成长、励志成才，社会反响热烈。

百家争鸣，方可百花齐放。我们广邀名师来基地讲学论道，营造海纳百川的教育氛围。2015年10月27日，我们邀请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湖湘大学堂组委会副主任周发源先生来到“湖湘大学堂”，讲述《毛泽东的人格风范》，湖南省社科界的专家学者、我校师生代表、中央驻湘及省内主要媒体朋

友1200余人参加了活动。演讲中，周发源将毛泽东主席的伟大人格概括为五个方面：立志高远、惟真务实、坚忍不拔、虚怀若谷、严于律己。主旨演讲结束后，周先生还就在场听众提出的励志与就业的关系处理、网络上诋毁毛泽东形象、怎样读书、论文剽窃、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当前开展“三严三实”活动、怎样培养坚忍不拔的性格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互动。聆听了演讲的观众一致认为，这样的活动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文科学素养服务，为推动湖南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战略服务，为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提供精神支撑。

第二节 润之讲坛

“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为了让本校近两万名大学生深入了解国史、党史、校史，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我们聘请一批本校以及省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为青年学子开设了一个思想论坛——“润之讲坛”。我们遵循崇德育人的规律，遵循学生成长的规律，让爱教活动真正服务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新生入学第一课，我们组织校史专家解读由毛泽东同志题写的“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校训和徐特立同志题写的“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引导他们树立“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高远志向，传承“知行互发”的哲学理念，发扬“人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同时，通过听取专题讲座和观看《恰同学少年》电视剧，全方位地帮助他们深入了解和学习青年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信念。培养学生的爱校之心、兴校之责。

为引导学生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不竭动力，“润之讲坛”邀请我校特级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原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的王沛清老师，为学生进行了一场“一师一个老教育工作者对教师价值的感悟”的专题讲座。讲座中，王沛清老师畅谈了自己的教师路，对“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怎样正确理解教育事业？”“你为什么当教师？”“如何从事教师这样有价值的职业？”这四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着重分析了一个引发同学们深思的问题：你为什么当教师？他总结道：“爱的内涵是付出不求回报，教师也因此而伟大。作为师范专业学生，你们要明确今后的事业，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王老师最后还详细讲述了成为一名优秀教师要做到的四个要点，将其自身经历与观点相结合，令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受益匪浅。

第三节 流动讲台

爱教活动不仅要请进来，更要掌握主动权，积极走出去，用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更多的社会大众接触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开设“流动讲台”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特色项目，为送爱教活动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而设立的活动讲台。通过与流动展览、流动舞台的相互配合，全方位、多角度地为社会大众传播红色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激发家国情怀和爱国热情。近年来，本基地流动讲台已先后来到岳麓山、橘子洲等景区，湖南警察学院、湖南大学、曙光小学等二十余所中小学开讲。从《青年毛泽东的人生追求与当代大学生的励志成才》《青年毛泽东的信仰之路》等专题讲座到《青年毛泽东游学的故事》《一封遗书背后的故事》《青年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的故事》《吃水不忘挖井人》等红色故事，同时辅以红色题材的歌曲、舞蹈、曲艺等艺术表演，生动、深入地向社会大众开展爱教特色活动，传播红色文化，反响热烈，效果良好。

第四节 党性课堂

红色资源是爱教活动的源头活水。翻阅第一师范的百年历史，就如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风雷激荡的红色篇章。

96年前，先驱者毛泽东、何叔衡就是从这里出发，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同时，当年代表上海出席会议的李达同志，后来也曾在第一师范任教。《国歌》的词作者田汉、工人运动领袖郭亮、独臂将军刘畴西等近40位载入《辞海》者，犹如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凝聚着党的奋斗历程、凝结着党的建设经验、蕴含着党的信念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积淀的珍贵的思想资源、文化资源、精神资源以及形成的物化形态资源，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我们以此为蓝本，深入研究，整合资源，积极打造党性教育的最佳课堂。我们相继成为省委党校、市委党校以及十余所高校的党史课程、党性教育课程及思想政治课程现场教学点。特别是市委党校与本基地联合推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追寻青年毛泽东成长之路》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系列课程社会反响热烈。通过组织学员来本基地现场看展览、听讲解、上党课等形式，深入了解青年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求学和奋斗历程，引导学员理解人生命运取决于青年时代信仰的选择和关键人生节点机遇的把握，领会“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的深刻哲理，得到社会各界的一直赞誉。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惯有心态。“等着上门受教育”，“板着脸开展教育”也成了社会大众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印象。这样一来，疏远了受众与红色基因之间的关系，使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充分盘活红色资源，以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独具特色的爱教活动，才能真正建构起受众与红色基因之间的桥梁。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从而产生了与此相关的许多重大节庆日、纪念日。我们在长期的爱教实践中发现，利用这些特殊的日子广泛专题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不仅能吸引社会大众广泛参与，而且能突出爱教活动的核心价值理念，弘扬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不忘初心、奋勇前进的决心与热情。在国庆、建党、建军、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重要的日子，我们开展了“我与祖国共奋进”、“与信仰对话”、“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我的中国梦”等各类主题展览和教育活动。特别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日，我们都会联合各相关部门，开展大型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汇集在基地的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举行重大集会，通过朗诵毛泽东同志诗词、歌咏红色歌曲、宣讲伟人故事以及主题演讲等形式，铭记伟人业绩，传承红色基因。

同时，基地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也是湖南省举行各类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首选场地。强强联手，崇德育人的力度和深度更为明显。2015年9月18日，我们联合湖南省旅游局、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教育厅、共青团湖南省委，共同举办了“铭记历史·圆梦中华”湖南红色旅游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旨在进一步牢记历史，发挥红色旅游的教育引导功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以实际行动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启动仪式上，我们还邀请了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六位优秀讲解员宣讲了红色故事，以独特的方式缅怀红色历史，追忆峥嵘岁月。湖南党史陈列馆陈艳讲述了《烽火岁月家国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胡蓉讲述了《伟大的父爱》，湖南党史陈列馆谭丹讲述了《两封感人至深的遗书》，毛泽东与第一师范纪念馆赵晓阳讲述了《毛泽东主办工人夜学的故事》，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肖焯一讲述了《一张珍贵的画像》，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高奇讲述了《战长沙》，引人入胜、催人泪下、昂扬斗志，赢得全场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我基地学生志愿者代表表演的诗

歌朗诵《松花江上》，将观众带回了当年那段难忘的岁月，重温那段令人撕心裂肺的历史，深悟国家沦陷的悲愤情怀。最后，全体人员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响彻全场，振奋人心。

第四章 特色体验

“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可如何让社会大众真正的走进历史，让历史的明镜照亮当下的道路呢？互动体验活动在这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身临其境，方可感同身受。本基地依托基地的爱教资源，延伸了爱教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通过体验式活动，真正引领受众成为历史的亲历者，从中感悟当下的使命和担当。

1917年，毛泽东求学一师期间，曾利用暑假徒步走访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长沙等地，通过游学调研农村，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在毛泽东同志游学100周年之际，我们组织400余名队员开展了“重走主席游学路，不忘初心跟党走”青年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将暑期科文卫三下乡与毛主席“读无字之书，求天下真理”的游学结合起来，引领青年学生“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队员们将在尽己所能为农村基础教育贡献青春力量的同时，深入当年毛泽东游学路线沿途开展百年前后发展对比调研，梳理当地百年发展变化，撰写专项调研报告。将服务社会与自我成长有机的结合起来，真正实现“我奉献、我成长、我快乐”的志愿服务精神。

如何让静止的文物资源“活起来”，用现代的语境生动地为当代社会大众所了解和喜爱呢？高质量的文体节目无疑是最佳的形式。

八班教室是本基地陈列复原的旧址之一，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的教室，见证了一大批“铁肩担道义”的进步教员的鼓与呼，也见证了毛泽东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恰同学少年”的激情与灵光。为了传承伟人精神，传播红色文化，让静止的文物本体鲜活起来，我们联合我校音乐学院教室编排了舞蹈《八班教室》，并参加了第5届中国舞蹈节暨第9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舞蹈以朴实出新、平淡见真的创作风格和信仰追求得到了中国舞蹈权威评委的好评，从全国27个省市的300多个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作品金奖的第一名，这是湖南省自1997年举办“荷花奖”以来获得的第一个金奖。中国舞蹈家协会

会副主席冯双白更是高度评价：《八班教室》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作品。

“毛氏六段操”的推广也是我们一项独具创意的爱教活动。毛泽东从小酷爱学习，同时也很重视锻炼身体，磨练意志。1917年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力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将体操和武术合于一体，创造出六段运动体操。后来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觉得很有价值，建议发表，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论文，论文第八部分即是“六段运动”。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击和跳跃等动作，共6段27节。他每天早起、睡前各做一次“六段运动”，课间也做上几段，以振奋精神。

为了向现代青少年传递这种精神，体验毛泽东所推崇的精神与体魄共完善的理念，我们联合学校体育学院专业教师，将书面的六段操改编成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广场舞的形式，配上昂扬向上的《第一师范校歌》的旋律，动作简单易学，旋律优美动感，既能展现出青少年青春焕发、风华正茂之气概，同时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强身健体。这段“六段操”一经推出，立刻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大中小学的热烈反响，大家对这种体验式、参与性的爱教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认同和赞誉。

第五章 红色影视

红色影视是指以革命话语为主要形式创作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传播思想、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媒介形式，对于让生长在和平年代的社会大众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形塑思想，构建价值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也越来越普遍地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推广和辅助形式。

《恰同学少年》是我馆在这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2004年，我馆联合长沙电视台、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这部被称为国内第一部“红色青春偶像剧”，反映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成长、成才历程的电视剧，展现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怀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励精图治、敢为人先的青春故事。该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台黄金时段的热播之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讨论，被赞誉为“教会了我们大学应该怎么办，老师应该怎么教，学生应该怎么学”的教育范本。不仅一举荣获了2008年的五个一工程特别大奖，同时也为我馆带来了创建馆以来的游客新高，且这种井喷

红色影视是指以革命话语为主要形式创作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传播思想、文化、价值和意义的媒介形式，对于让生长在和平年代的社会大众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形塑思想，构建价值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也越来越普遍地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推广和辅助形式。

《恰同学少年》是我馆在这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2004年，我馆联合长沙电视台、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这部被称为国内第一部“红色青春偶像剧”，反映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成长、成才历程的电视剧，展现了以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怀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向，励精图治、敢为人先的青春故事。该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台黄金时段的热播之后，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和讨论，被赞誉为“教会了我们大学应该怎么办，老师应该怎么教，学生应该怎么学”的教育范本。不仅一举荣获了2008年的五个一工程特别大奖，同时也为我馆带来了创建馆以来的游客新高，且这种井喷的热潮持续至今，有增无减。

我们在此基础上，又与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长沙电视台等先后合作拍摄或协助拍摄了《风华正茂》《建党伟业》《湘江北去》《毛泽东》《长沙保卫战》等一大批红色影视作品，我们结合参观游览，收到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好评如潮。目前，本基地旧址已经成为了国内知名的红色题材影视作品的拍摄地。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的母校，我们深感任重道远。崇德育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红色基因是我们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高擎崇德育人的大旗，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感人，生动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唱响爱国主义主旋律，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牢不可摧的红色基因。